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December 2020 第五期

| 時事評論 |

告別神話，回歸現實：香港的新常態與前路 袁彌昌
後國安法的議會路線困境 區諾軒
香港現時情況及局勢 孫海峰

| 研究論文 |

地緣視角下美中印互動關係發展 徐偉光、蔡東杰
中國大陸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研究 陳銘聰

| 會議紀實 |

2020年9月座談會：歐中與美中關係發展
2020年11月座談會：美國總統選後的亞太安全



東海大學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Tunghai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December 2020 第五期】



東海大學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Tunghai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發刊辭

現代的政治及經濟環境隨著時代的變遷，呈現劇烈的變化，出現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景況及困境；此時，溝通平台的建立變得更加重要，我們希望能藉著期刊的建立，提供一個園地供學者們闡述其不同的理念與想法，也讓我們的讀者能了解區域環境的變化及其重要的議題。這次由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及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共同創立的刊物《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便是希望能透過論文的發表形式，為學者提供一個有效的交流平台，我們更期許它能成為台灣重要的發聲管道，為學術奠定基石，並有深遠的影響。

隨著網路科技進步，生活的環境產生了重大的改變，資訊的傳播與人際之間的關係連結，都跟以前大不相同，在各自分工的領域上，也愈來愈精細。然而政治經濟的課題變動也顯得更加快速，新興的議題不斷湧現，亟需專家學者提出看法及因應之道。然而有些議題是以前少見到的，像負利率的出現、人工智慧的大量應用及人口老化的問題等等。更加上積弊已久的沈痾，像資本的過度集中、貧富不均的問題急速惡化、



國際間的貿易對壘嚴重，皆是刻不容緩的，且需要有智慧的處理。因此如何營造出一個公平效率又有正義的社會，為學者無法逃避的責任，我們期許能為社會盡一份心力，也盼望這個社會更加美好。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

陳文典

2019.04.25

主編的話

美國總統大選在 2020 年 11 月結束投票。形式上民主黨的拜登（J. Biden）贏得了過半的直接選票與過半的選舉人票，但現任的共和黨總統川普（D. Trump）尚未放棄，對選舉過程提出了法律訴訟。儘管選舉的爭議尚未完全結束，拜登仍舊開始組閣的動作，並且進行政權交接。在美國總統大選仍舊紛擾的當下，新冠病毒（俗稱的「武漢肺炎」，COVID-19）也在全球多個國家進入第二輪的高峰，對全球的經濟發展產生破壞與影響。

在美國大選爭議、新冠病毒肆虐的當下，亞太地區的政經發展也有許多潛在的衝突點持續存在僵局。首先是兩岸，延續著美國總統大選以前的「冷和」格局，兩岸仍舊停留在沒有溝通、沒有對話的階段。不僅如此，中國大陸持續派出大量的機艦出現在台海周邊，而台灣則是持續向美國爭取軍購，讓兩岸的軍事對峙始終在一個緊繃的狀態。隨著美中衝突未見和緩的情況下，中國大陸與澳洲也出現了外交上針鋒相對、甚至高築關稅壁壘的情況。澳洲和中國在外交上齟齬不斷，也提升至經濟與安全議題上的對抗，增加了中澳之間的矛盾，也成為新的衝突熱點。



處了兩岸、中澳之間的衝突之外，美國宣布將重新恢復「第一艦隊」，連結東北亞的第七艦隊與南亞和印度洋的第五艦隊，在東亞地區強化了軍事的部署。這些舉措都顯示出亞太地區，在短時間內各種衝突與矛盾不但不會化解，甚至都有升高的趨勢。

此外，在香港地區，北京以港版國安法，展開對民主派嚴厲執法的動作。「香港眾志」的成員黃之鋒、周庭、林朗彥遭到判刑；香港蘋果以及壹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遭到拘捕；民主派議員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和梁繼昌資格遭到取消…等，北京與港府一連串的動作，引起美國的介入。眾議院通過的《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讓香港人申請美國庇護的門檻降低、美國宣布對港區特首林鄭月娥，以及人大 14 位副常委進行制裁，甚至調整了共產黨員申請美簽的規定等，在在都顯示了香港持續是美中衝突的一個結點。

基於此，《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在第五期的期刊中，邀請了三位香港的學者專家針對香港的近況撰文分析。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袁彌昌（前新民黨政策總裁、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學系講師、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區諾軒（目前在東京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攻讀博士）、以及在台灣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攻讀碩士的孫海峰，三位香港的朋友撰文分析了香港一國兩制的困境、立法會議會路線的現況、以及政治發展等議題。另外，兩篇通過匿名外審的學術專論，分別是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兼任法政學院院長）的蔡東杰教授，以及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博士徐偉光，撰寫〈地緣視角下美中印互動關係發展〉一文，分析美、中、印三國的外交

與軍事角力。另一篇為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陳銘聰，撰寫〈中國大陸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研究〉。都值得與讀者們分享。本期期刊也刊登了兩篇由協會舉辦的座談會會議紀錄，分別是九月時舉辦的〈歐中與美中關係發展〉；以及十一月時舉辦的〈美國總統選後的亞太安全〉。三篇時評、兩篇研究論文、加上兩場的會議紀錄，對於當下的香港、亞太的區域發展，都有相當精采的討論，本刊稟持鼓勵對話與發表的精神，提供學者專家發表的平台，不代表期刊與協會的立場，願與期刊的讀者分享，也歡迎讀者朋友的指教。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主編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理事長

沈有忠
2020.12.11

“ 本期目錄 ”

發刊辭 / I
主編的話 / III

| 時事評論 | Current affairs review

- ▶ 告別神話，回歸現實：香港的新常態與前路
Farewell to Legends and Return to Reality:
Hong Kong's New Normal and the Way Forward
袁彌昌 /3
Derel M C Yuen
- ▶ 後國安法的議會路線困境
The Ruin of Legislative Politics under Post-national Security Law Hong Kong
區諾軒 /9
Au Nok Hin
- ▶ 香港現時情況及局勢
Changes in Hong Kong's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Outlook
孫海峰 /15
Stephen Suen

| 研究論文 | Articles

- ▶ 地緣視角下美中印互動關係發展
Development of US-China-India Triple Relations:
View of Geopolitics
徐偉光、蔡東杰 /25
Wei-Kuang Hsu, Tung-Chieh Tsai
- ▶ 中國大陸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研究
Research on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陳銘聰 /41
Chen Ming-Tsung

| 會議紀實 | Forum minutes

- ▶ 2020年9月座談會：歐中與美中關係發展 /71
- ▶ 2020年11月座談會：美國總統選後的亞太安全 /91

協會簡介 / 101
徵稿啓事 / 103



|| 時事評論 ||

告別神話，回歸現實：香港的新常態與前路*

Farewell to Legends and Return to Reality:
Hong Kong's New Normal and the Way Forward

袁彌昌**

Derel M C Yuen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0.12 第五期，頁 3-7。

** 袁彌昌為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

經過 2019 年的政治風波後，我們幾可肯定一國兩制作為一個實驗已告結束，北京已經放棄將香港視為一個自治城市的僅餘想法；在中美的夾擊下，香港的特殊地位亦岌岌可危，就連一向引以為傲、賴以生存的香港模式也蕩然無存——這就是香港目前的狀況，彷彿一切正在解體並推倒重來。

壹、一國兩制實驗結束，政治緩衝區功能被取消

之不過，只要我們細看香港如何一路走來，便會了解到真正賦予香港獨特意義與地位的是作為一個自由港、國際金融中心及中美或中西緩衝區。在這大前提下，一國兩制可理解為嘗試在這基礎之上，建立一個恒常性並為西方所接受的政治與制度上的安排，全面落實的話，可令香港再上一個台階，但無論成功與否，一國兩制實質上也在為香港在後冷戰時代延續冷戰格局，令香港的特殊地位得以延續下去。

很可惜，作為中西之間政治、經濟與外交的緩衝區，北京與香港都未能克服北京嘗試滿足港人的民主願景，以及西方國家希望利用香港影響大陸走向自由民主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但隨著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法案，取消香港繼續享有《美國—香港政策法》中賦予的特殊待遇，並制裁中央及香港政府官員，而北京亦祭出《國安法》，實際上就等於雙方都取消了香港的政治緩衝區功能。

貳、退回到香港的「天然狀態」

一國兩制在政治上行不通對香港及港人而言固然是一件大事，然而實際意義卻是一國兩制作為一種政治與制度上的安排，無法令香港再上一個台階而已——既然上不了下一個台階，那麼很自然的結果，就是退回到原本的自由港、國際金融中心及緩衝區狀態，繼續保持政治以外的經濟與外交功能。

由此可見，作為一個自由港、國際金融中心及緩衝區，從來都是香港的可依靠的退路或退一步的選項（fallback option），甚至是一種「天然狀態」。

川普政府雖然單方面認為香港其他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亦應一併取消，不過他去年瞄準的是香港的政治「缺口」，當然能夠輕鬆拿下，現在想摧毀香港的自由港、國際金融中心及緩衝區基礎，卻沒有那麼容易。事實上，在國安法實施以及香港不能再為西方國家和平演變中國的條件下，不排除香港長遠存在一個更穩定的基礎，這也是「天然狀態」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於北京須保住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即使國安法實施後也不代表它可以在香港予取予攜。事實上，在國安法之下，北京可讓香港繼續擔當行之有效的國際金融中心的選項並不多：它必須讓香港保持基本的司法獨立、新聞與言論自由等，須確保政治穩定但總不能天天挑起政治矛盾，所以北京也難以長期延續目前的政治路線，因為這種鬥爭政治實際上會破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中國大陸的窗口角色的根基。

參、香港模式的全面破產

所以簡單來說，即使在後國安法時代及中美角力之下，香港的情況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悲觀，相反所謂的香港模式正面臨全面破產卻乏人問津，情況更令人擔心。

儘管在回歸以來，香港的發展模式和制度支柱已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與弱點，但總算仍能發揮正面作用。可是在短短一兩年間，行政管理型政府全面失靈，以往如神話般的公務員團隊從天上墮進了地獄；「積極不干預」淪為「權貴資本主義」，桎梏了港人創新創業精神；由所謂「獅子山精神」衍生出來的社會秩序與規範，今天卻被視為「離地」和不切實際。上述這些包含政治、經濟、社會的核心元素，一直以來互為影響互相緊扣，構成了一種獨特的制度安排，然而這些曾為香港帶來繁榮安定的制度安排，如今全都轟然坍塌，令香港面臨一個巨大的社會危機。

一個發展模式正在瓦解，意味著社會必定是支離破碎、內耗不斷，無從衍生出一種社會規範，繼而無法凝聚人心，團結大多數人。隨著前面幾代人的精神和價值逐漸逝去，香港將出現一個精神和價值真空，使人們萎靡不振、無法自救。

最麻煩的是，假如香港不能重新振作，不能訂立新目標與方向的話，那麼香港就只有急速大陸化一途。所以如何減少內耗，不讓香港傾覆，令香港在這關鍵時期繼續走下去，實已成為今後的最重要課題。

目前香港的狀況，可能只有諸葛亮剛主政後的蜀國可比擬：當時蜀漢經歷了關羽敗亡、劉備夷陵慘敗病逝，蜀國出現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益州南部叛亂迭起。諸葛亮初主蜀政，隨即針對政治合法性問題，重建人們對蜀國的信心與認同，並且處理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兼顧政治意義與行政管理效率，平定南方叛亂，短短四年間便令蜀國再次站穩腳跟，將有限的資源有效地動員和組織起來，形成北伐的進取力量。

肆、港府乏行政能力與效率

當然筆者不會指望港府可與諸葛亮治蜀相比，然而諸葛亮以外來人士身分治蜀取得成功與合法性，除了以法為本、賞罰分明之外，更重要的是其行政管理效率。據筆者所知，目前港府的行政效率低下，是由於缺乏足夠的人手與能力，特別是高級決策和管理人員，以致工作遠超其負荷，基本上能讓政策出台已屬萬幸，已到了不能講求質素與效果的地步。

但如此一來，就等於我們無法指望政府可為香港制定今後的戰略：特別在這個前景混沌不明的時候，假如政府持續不振，不能為香港訂立目標和方向的話，那麼香港就只有急速大陸化一途，這實際上對誰（包括北京）都沒有好處。因此政府有必要大舉諮詢民間智囊與專家，集思廣益，切忌閉門造車，斷送香港前途。

伍、再無「應許之地」

目前一國兩制回到起點，同時香港以往的發展模式和制度安排全面瓦解，除國際金融中心之外幾乎失去了所有坐標，港府及港人委靡不振，恍如渡過了紅海的摩西與以色列人，面前是一片曠野，不知何去何從。

與原先的一國兩制構想已不一樣，如今港人再沒有「應許之地」，之前一切

民主、繁榮、穩定的承諾，已再非理所當然或制度安排，今後必須靠自己爭取。任何一方如欲作進一步推展，則必須賦予這時代一個新的政治主題，指出今後香港的發展方向及需要，建立新的香港論述，否則將難有寸進。

如今香港已淪為一個殘局，要指望有一套新的且各方接受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緣木求魚；在各方缺乏共識下，仍具一定認受性和約束力的框架，事實上就只剩下最初構想的鄧小平式一國兩制，回到當初北京希望保有一如港英時代作為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那是一個經濟城市，而非政治城市，保留它對中國的經濟價值，以及繼續作為中西之間的經濟橋樑，這是一條可依靠的退路。但假如各方堅持己見，任由香港在沒有框架之下走下去的話，結果只有兩個：一是在無人駕駛下，幾年內香港急速大陸化，二是北京索性推倒重來，由它全盤制訂香港的制度，兩者都是港人最不願看到的。因此我們有必要以鄧小平式一國兩制作為基準點，讓香港在那裏站穩陣腳，重新起步，這也是香港退回到其「天然狀態」的重要一步。

後國安法的議會路線困境*

The Ruin of Legislative Politics
under Post-national Security Law Hong Kong

區諾軒**

Au Nok Hin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0.12 第五期，頁 9-14。

** 區諾軒為前香港立法會議員、東京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博士生。

2020年11月11日，隨著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和擔任議員的要求，4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立即被取消資格，也引發了全體民主派議員總辭，標誌著香港議會政治的整肅。雖然在區議會層面，民主派仍然在任多數，但還有多大議政空間，實在不敢樂觀。新華社表示，這次取消資格的決定，是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要求，我們無法得知究竟真的是林鄭月娥主動提請，還是北京早有此打算，但對於政治制度的影響是，行政機關可以憑一己喜惡，上表中央後，隨即取消議員資格，這是對於行政立法關係的莫大侵害，也代表今天在香港擔任在野反對陣營議員，隨時都可以失去議員資格。

壹、「行政主導」的演變

四年前，立法會曾鬧出宣誓風波，六名新當選的立法會議員被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指控違反宣誓誓言，不尊重基本法及效忠中國和特區，人大釋法後，經法院裁定失去資格。此舉本來已經對立法會造成傷害，也無視選出幾位議員的民意，只是，當時尚要裝飾門面的法律程序，如今也棄之如敝屣。這種行政優先於立法機關的看法，與北京以及親政府陣營的定性有關。他們表示香港從來只有行政主導，沒有三權分立，在2015年否決政改方案後，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一個《基本法》研討會上強調「香港回歸前不是，回歸後也不是實行三權分立」，此說法一直是中聯辦、港澳辦論調。¹有趣的是，最近有人翻查回歸慶典的小冊子，內文寫道：「香港的政治制度是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建立，有一個行政主導的政府，以及「『三權分立』是指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各自獨立運作」。²

行政主導本來的意思是賦予行政機關相當的主導權，現在則似乎遭解讀為必須為行政機關是從。自港英殖民政府以來，立法會的法案撥款基本上已由政府主

1 〈港不實行三權分立〉，《東方日報》，2015年9月13日。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50913/00176_030.html。2020/12/07；〈香港中聯辦發言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由其實制地位所決定〉，《新華網》，2020年9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07/c_1126463870.htm。2020/12/07。

2 〈【回歸初時】政府曾指政府體制是「三權分立」原則建立〉，《NOW新聞》，2020年9月5日。<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04417>。2020/12/07。

導，議員提出私人條例草案須經行政長官批准，如今則演變為凡被指控不尊重基本法及效忠中國和特區、勾結外國勢力、阻礙議會運作等等，都隨時出局。這些指控可以很主觀，也隨時因應局勢挪移，今年取消四名議員資格前，林鄭月娥仍然就立法會押候選舉的問題上表明參選資格與議員資格應分開處理，短短三個月便改變主意。³ 缺乏制度與規範的香港政治現局，正常人都很難抱有任何前景與希望。

鄧小平的愛國者治港論，往往成為了消滅民主運動的理論基礎：「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⁴ 在往後的政治爭議轉捩點，不時也看到官方聲明重覆這論調，包括 2014 年政改爭議中，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2017 年中共十九大報告，以及最近取消四名立法會議員的理據。按照上述框架，在野反對陣營不是沒有生存空間，前提是不要觸碰任何國家安全，甚至最近越來越強調的政府運作等等底線。

多年來，民主派作為監察聲音，市民的期望是政府運作不可太一言堂，不斷推出港人主流不受歡迎的政策，但既有體制下可以發揮的空間本已有限。不外乎：揭發政府流弊、透過議會抗爭拖延法案撥款速度、跟進市民受侵害的案件要求政府負責。但從廣深港高鐵興建、引發的一地兩檢制度爭議多年仍通過可見，政府要讓心儀項目通過，在建制派壟斷的立法會而言只是時間問題。將上述空間放到新近北京的決定，或許好些民生政策問題將來仍然可以透過立法會跟進，但無可避免要面對以下困境，第一，參選資格已經受嚴格而主觀的限制，政府隨時有新演繹，將不喜歡的政治人物排除於選舉資格外；第二，政制問題已難見曙光；第三，議員反對的力度，與被拘控及取消資格的風險成正比；第四，建制派主導的議員，幾乎沒有可能投票上取勝對手。這種環境下，除非有人自命安於安全線議事，否則親政府陣營以外的政治人才參與制度，可以發揮的空間很有限，亦難以

3 〈林鄭 7 月底堅稱參選資格與議員資格應分開處理 3 個月後請求 DQ 4〉，《蘋果日報》，2020 年 11 月 11 日。<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1111/SLKCDMCGK5EBLLRZ5CL5PW3GFU/>。2020/12/07。

4 1984 年 6 月會見香港各界訪京人士：《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符合相當程度的香港市民期望，這就是一些親政府人士所說「忠誠反對派」的議事空間。

貳、永遠由北京控制的選舉

回歸 23 年的選舉實踐證明，北京的核心目標只有一個，建立一個永遠由親政府陣營穩定控制的選舉。選舉威權政體一方面是政制改革，一方面是朝野陣營誰能爭奪民意，定期選舉無論多不公，實際仍是反映誰主宰民意。⁵ 香港立法會的議事空間萎縮，選舉的場域同樣荊棘滿途。2020 年本應是立法會選舉，民主派為了爭取最大勝算，提出 35+ 計劃，協調陣營內的候選人，以最好的陣容出戰選舉。但此舉卻被北京冠以奪權惡名，政治打壓危在旦夕，也接連遭遇提名期取消不少候選人資格，立法會選舉藉新冠病毒疫情延期至少一年，今後何時才會重啟立法會選舉，懸而未決，但取消選舉和接連的政治打壓，亦肯定打散了香港人透過選舉求變的希望。

正常的政府面對龐大的反對民意，本應作出一定程度妥協，或者與反對陣營尋找出路，以消滅民怨。除了撤回逃犯條例，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訴求不但一再漠視，更開始消極抵制民主派主導的區議會，務求造成在野陣營難以執政的亂象，鬥爭性思維令朝野合作變得更沒可能，社會更撕裂。作為地方行政部門的民政事務署改變慣例，屢次按議程內容不提供秘書處服務，拒絕批出地區撥款、議員開支等等。雖說如此，區議會層面要求選區服務（constituency service）為主，民主派尚算維持區議會應盡職能，但未來政府會否進一步收緊區議會空間，則有待觀察。

環顧歷史，區議會選舉共四百多席，2003 年 50 萬人參與 7.1 遊行反對國家安全法立法，繼而導致民主派區議會取得 151 席，是當時區議會選舉以來新高，令北京開始設想積極介入本地事務，特別是選舉工程。2019 年受惠於反送中運

5 詳情可參考 Gandhi, Jennifer, and Ellen Lust-Okar (2009). "Elec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2: 403-422.

動，民主派史無前例地贏取 388 議席，不難想像，區議會將會是下一步政府有意整治的地方。

為了直接控制選舉，2003 年後北京逐漸建立獨立於本地建制派的動員系統，在中共刊物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聲言要建立第二支管治梯隊。⁶ 中聯辦透過發展本地同鄉會、商會、社區組織動員網絡，要求他們在選舉只支持心儀的建制派候選人，此外，各政黨區議員及地區組織需要上繳戶口簿（動員名單），掌握社區滲透程度。

2019 年反對逃犯條例引發的抗爭運動，引發了下半年持續不斷的上街示威。政府強硬的立場令社會不滿持續，特別是中間派無法說服執政陣營，包括前高官、議員聯署、以致社會領袖被邀往禮賓府與行政長官會談，均指向兩項核心：撤回逃犯條例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查明衝突真相。累積的不滿使驅使市民透過區議會選舉表態，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 11 月 26 至 28 日的調查，87.8% 民主派選民認同區議會選舉是抗爭運動的變相公投，即使建制派支持者也有 49.2% 認同這點。當時正值警察攻入中文大學以及接連的理大圍城之戰，大量市民為了突破警方包圍理大的抗爭者而在九龍大規模衝突，成為抗爭運動的轉捩點，不論是執政還是反對陣營，均有意塑造選舉為一次公投表態。⁷ 結果出乎意料地突破了多年來建制派穩定控制的區議會，也打破了建制派多年來建立的動員體制。我們要問的問題是，投票表態，還能容於 2019 年後的香港嗎？

參、結語

無疑，去年的反送中運動是令北京決定改造香港的導火線，但運動反映的，

6 中共中央黨校刊物，〈「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學習時報》。

7 李立峯，〈區選選票、民調數字，和民意現狀〉，《明報》，2019 年 12 月 5 日。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191205/s00022/1575467052490/%E5%8D%80%E9%81%B8%E9%81%B8%E7%A5%A8-%E6%B0%91%E8%AA%BF%E6%95%B8%E5%AD%97-%E5%92%8C%E6%B0%91%E6%84%8F%E7%8F%BE%E7%8B%80%EF%BC%88%E6%96%87-%E6%9D%8E%E7%AB%8B%E5%B3%AF%EF%BC%89>。2020/12/07。

是一國兩制走進了死局，多年來各方念茲在茲的，北京而言是國家安全，故此有23條之議；很多香港市民在乎的是民主普選，關乎政治權力保障個人，但從頭到尾，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也不存在於選項之中，如今國安法已立，無數在乎香港未來而抗爭的年輕人，還有各專業領域人士，則受盡被捕、下獄、辭職諸般惶恐，普選卻仍然遙遙無期。民主派的剩餘空間，或許只有在區議會層面奮力服務市民，團結公民社會，守護在各專業被親政府人士無理投訴，遭受打壓的市民，大概要渡過凜冽的寒冬，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人類社會希求的應該是文明進步，香港反其道而行，實在無可奈何。

香港現時情況及局勢*

Changes in Hong Kong's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Outlook

孫海峰**

Stephen Suen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0.12 第五期，頁 15-20。

** 孫海峰為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壹、背景

香港回歸中國大陸 23 年，一直以基本法及實施一國兩制，香港人治港方法，統治香港，用鄧小平的說話，就是馬照跑舞照跳。還一直欣欣向榮，股票大升。

香港地理環境優越，是中國南大門，也是中國對外的窗口，面對太平洋，真是得天獨厚的岩石海岸，方便貿易船隻出入，促進香港經濟貿易的發展。

貳、紅色經濟的入侵

自 1997 年從英國回歸中國後，中國政府一直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從不同方面影響香港，包括民生、股票、樓市、地產、法律、教育、及政府各部門的滲透等，特別是用人口政策，大量新移民湧進香港，從而達到其政治目的，手腕不痛不癢地順利過渡。

基於以上各種情況，香港屬於中西窗口，各方勢力自出自入，尤其是各國資金都可以交匯於此，也成為中共有錢人的資金避難所，所以香港為各方勢力集結地，關係錯綜複雜盤根錯節，因為有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保護。

與澳門賭場相比，香港更是成為一個環球大賭場。因為大陸國營企業或者有實力的私營企業都選擇在香港上市，其中原因包括審核容易，集資金額可以很大，上市之後可以再分拆上市，令其市值可以不斷膨脹，脫離其公司真正的價值，直接後果就是推高香港所有的物價，使香港成為全球最貴城市，令年輕的一代永遠沒法可以負擔起買樓的價錢，可惜政府又未能推出相應公營房屋，使有能力買樓人仕也未必有能力供樓，令香港治安及年輕一代一直處於定時炸彈的位置。

參、香港整體面臨情況

一、香港自身問題

另外香港也是全球貧富懸殊嚴重的地區，在重商的環境中，政府要施行惠民政策也是寸步難行，再者，中國紅色資金不斷湧入香港，推高香港樓價物價指數，更借助香港是國際金融地位的優勢，把大量的國有資產及資金由香港轉移至大陸高官的私人戶口，使香港成為全球洗黑錢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再加上自由行在香港不斷地擁入，自然文化衝突也就加劇，而最重要的是，自由行壟斷了香港的旅遊業，使到香港遊客的性質，主要依賴中國遊客，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發生，例如台灣及泰國等等，因為中國遊客之多，使得到酒店及旅遊運輸等資源都被中國遊客所佔用，當然也使其他國家遊客相對數量就會大減，經過一段時間後，中國大陸只要不開放自由行，香港整個市場及整個業界將受到嚴重的影響，使其統治或影響性籌碼加大，進而能達到其政治目的。

二、媒體的角力

香港在文化推廣及媒體的宣傳方面，一直受西方文化的薰陶及影響，再加上香港多份媒體雜誌都是以西方主流價值觀及賺錢為目的。自從回歸後，紅色媒體不斷地影響香港，其中包括多份報章雜誌，例如文匯報、成報、明報等，及一些英文報刊雜誌，漸漸被金錢利潤所誘惑靠向中共紅色媒體，作為其在香港的口舌；控制多間書商及出版社，例如中華書局、商務書局、三聯書局、聯合物流等；打擊香港其他報館，使他能夠壟斷香港媒體，例如較早前打擊蘋果日報等，如果只是以賺錢娛樂為主的報章雜誌，則免於受害，例如東方日報。

電子媒體也是其主要的市場，控制香港多間電視媒體，例如無線電視、中央電視及深圳衛視，持反對意見的電視台則遭受到結業的後果，例如亞洲電視、黃金電視等一系列，就連香港政府擁有的商業電台及商業電視持反對意見者，全部換人。

當然少不了最流行的網路媒體，作為操控的手段，不時發佈一些消息來混淆視聽，從而影響市民正常的判斷力。

眾所周知，最具影響力的媒體是一唱一和，或者是一個唱白面一個唱黑面，故此，在中國國內媒體，一直以負面新聞報導香港，或一些民間座談會挑起中國人民和香港人之間的矛盾，所以普遍中國人民對香港人的印象是中共黨國一再忍讓香港的各種是非，中國傾全國之力支援香港，反而得到香港冷淡的回應，另一方面中共的官媒卻表現出很友好的姿態，很大度的胸襟，不計較香港人民的反叛，以予原諒及不計前嫌，任何國家重大計劃都把香港計算在內，給予極大援助。

故此，站在道德至高點，及民間團體支持，使其方便推行其政策，不至於受到很大的反對及阻撓，不然則出師有名。

三、公營事業的壟斷

自從九七回歸後，香港公務人員必須每年回到祖國接受訓練或交流，辦大型座談會等。一方面拉攏現在的政務官及紀律全體，一方面注入一些愛國思維，使其失去對自身的自我價值觀，從而被引導成為其政治工具。對現今世界所推崇民主價值有所抵觸，而最典型的例子是「官員不再是人民的僕從，應該是人民的父母官」，驟眼看似沒有什麼不妥，因為父母官並非社會主義國家或民主國家的思想，而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因為這套想法權力極大，需要個人有極高的道德規範自我，有沒有機制去制衡，所以很多國家不取。再而為了國家利益，為求目的做事可以沒有底線，正如香港大法官沈小民法官對八三一灣仔暴動案（編號Dccc12/2020）批評，檢控官權力無限大，要怎樣就怎樣。

當然，動亂平靜後就是秋後算帳，加上國安法的通過，令香港 23 年未能通過條例，九七年應該實行的條例，現在才算正真落實，效果立竿見影，馬上立法會民主派四位議員，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梁繼昌被開除，又警告其他議員不夠愛國就不能治港及演變成民主派集體辭職，最後會發展至清算地區民主派區議員。使泛民在香港失去影響力或依中共之政策辦事。

加上今年香港疫情嚴重，政府更是使用強硬手段，又取消立法局議員選舉，改由中央人大常委會決定全部留任，但又取消四名議員資格，這顯然是權力操控

及玩弄權術，以達至民主派的力量減弱，因為在地區議會選舉中民主派大勝，所以借此不能再讓泛民在立法局議席中取得成果。

另外香港政府更多提及落實境外投票，使已移居深圳及大陸香港人可以在大陸投票，選舉會更提出使用關愛隊及電子投票從法律上及技術上是可行。

肆、特首再講施政報告中的香港未來發展

今年特首施政報告一再延後，主要是因為要讓習近平在深圳討論大灣區事宜，配合中國國家的發展，香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為主，因為香港回歸後一直被邊緣化，但中國大陸人民認為香港回歸祖國後一直以光榮孤立自居，不想主動與大陸互動，又認為香港一直是反動革命的基地，所以這次特首的施政報告中，其中一項重要的改革是教育通識改革，更需要加入愛國精神及重視中國歷史部分，這其實是國民教育科的翻版還魂，有機會促使移民潮加劇。

特首施政報告中提及的宣誓條例，促使香港人參加公職人員時所有公務人員都要宣誓效忠中央及香港政府，其中更包括區議員和選委會的成員。

伍、香港的未來結論

總結來說，任何政治過渡都會面臨衝突的結果，尤其是兩個國家之間的政權移交，1997年香港回歸，卻是順利過渡得讓人覺得可怕，原因是用基本法第五條來作一個交換條件，矛盾其實一直都存在，至於《基本法》第5條指「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主要是為了明確肯定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不是為了訂定一個限期。但當時局不斷變化時，尤其是中國大陸變得越來越強大，經濟體系全球排名第二，甚至挑戰第一名的時候，香港也需要作出變動，更需要有大的變動才能夠配合中國大陸的成長，但可惜在成長的過程中和中國大陸的距離越離越遠甚至被拋離的時候，兩地的矛盾及衝突也將越來越大，故此才有此次雨傘運動的根本原因，也打開了在1997年回歸是埋伏的炸彈。終歸來說，

從層次上來說，2020年，經過鎮壓暴動、立法會的民主派被清算、資本家的出走、香港司法的踐踏，更確立人大釋法凌駕香港基本法，使香港走上有中國特色的資本社會主義，也算是再次回歸祖國大陸。



|| 研究論文 ||

地緣視角下美中印互動關係發展^{*}

Development of US-China-India Triple Relations: View of Geopolitics

徐偉光^{**}、蔡東杰^{***}

Wei-Kuang Hsu, Tung-Chieh Tsai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0.12 第五期，頁 23-39。

** 徐偉光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博士，現任退輔會苗栗榮民服務處處長。主要專長和研究領域包括：國際關係、東亞區域安全、美國外交政策等。

*** 蔡東杰為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目前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兼任法政學院院長、日本總合研究中心主任與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專長和研究領域包括：國際關係、東亞區域研究、中國外交政策與兩岸關係問題等。

摘要

自從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美國採取更積極全球佈局，南亞次大陸地緣位置乃逐漸凸顯出來，加上歐巴馬時期推動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不僅美國拉攏印度之政策方向愈發明顯，尤其中國在 2013-15 年逐步推動所謂「一帶一路」戰略後，既牽動整體歐亞地緣戰略格局，美國、中國與印度之互動愈發敏感，結果也值得關注；在此，本文將試圖運用地緣政治與戰略三角視野進行初步分析。

關鍵詞：一帶一路、美中印關係、地緣政治、戰略三角

壹、美中印之複雜三角互動

一、美中關係：日益迫近之霸權對決

自新世紀伊始，美中關係之日益複雜與緊繃早已不言可喻；例如，前中共全國人大外事工作委員會主委傅瑩曾以「水乳交融又水火不容」來加以形容，可說是恰如其分的描述（中國日報，2014）。儘管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一度在 2005 年起的第二個任期中以「負責任之利益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取代其前一任期直接以「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來定位中國的態度（柳惠千，2020：103），且迄今美國還是在多數競爭指標（包括經濟與軍事）維持著領先地位，中國崛起之持續可能性仍展露愈發明確的「追趕」態勢，尤其是全球金融海嘯導致雙方地位更加「平等化」的結果，不僅讓美國深感芒刺在背，美中關係亦儼然成為當前世界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係。例如，根據美國陸軍在 2014 年發佈的《在複雜的世界中獲勝》研究報告（US Army, 2014），中國非但和俄羅斯同被列為與美國「存在競爭關係的霸權國家」，其未來分析似乎也暗示著一場難以迴避的衝突。至於在川普（Donald Trump）上任後，無論在 2017 年所發表任內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王高成，2018：1-7），將中國與俄羅斯並列為企圖修正現狀的國家，抑者或根據白宮在 2020 年 5 月最新擬定之《美國對中國戰略方針》（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White House, 2020），直接點出壓制中國之必要性，在在顯示其關係之空前緊繃。

對此，希冀維繫霸權地位的美國勢必進行長期佈局與政策因應。首先是小布希時期採取的「隱性圍堵」戰略，其次是歐巴馬在上台後高舉之「重返亞洲」大旗（王高成、王信力，2012：47），例如前國防部長潘尼塔（Leon Panetta）於 2012 年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中雖聲稱「無意遏制中國」，仍宣示美國海軍仍計畫自 2020 年起將主力六成移轉至太平洋地區以遂行「再平衡」（re-balance）新戰略的說法（Howorth, 2015: 199），不啻是此一布局最引人關注之轉折點。正

是在此邏輯下，自歐巴馬時期起，美國對華戰略佈署似乎透露出「硬的更硬，軟的也硬」的新走向，無論各種強化軍事佈署措施或不斷擴大演習規模等，針對中國大陸而來的「敵對性」已昭然若揭。

相對地，北京方面對此亦非無所反應或作為。在「不衝突、不對抗」的政策指導下，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在 2013 年以「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為題發表的報告指出（黃平，2013），在兩國實力差距縮小及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影響下，尤其「美方防範心理明顯加重，且加緊在中國周邊投棋布子」，結果將使美國可能「更多地轉入亞洲地區爭端」，從而亦埋下不確定變數；可以這麼說，近年來中國海軍在東海地區之頻頻主動出擊，表面上雖似乎針對日本而來，或許其真正目標乃是對美國在第一島鏈之戰略佈署施加壓力，以達成其「反介入」的設計作為（蔡明彥，2017：37-54），目的在瓦解島鏈之戰略限制性。

二、美印關係：亞太再平衡戰略之南方環節

值得注意的是，繼冷戰時期的蘇聯之後，中國雖於後冷戰時期成為美國再度啟動「圍堵」戰略的新對象，不過，從學術界對此存在高度共識，但美國政府卻始終矢口否認看來，美中之間這場潛在的「新冷戰」顯然與先前二十世紀後半期的例證略有不同（Woodward, 2017）；主要差異首先乃目前存在著一個更多元且全球化的環境，其次，相較蘇聯大體僅能在核武部門與美國達成「恐怖平衡」，如今中國不但從總體國力到尖端軍武發展等層面都存在迫近競爭感，美國本身也正因經濟衝擊面臨著「霸權衰落與否」的關鍵點（Lachmann, 2011: 44-49; Brown, 2013）。

在此情況下，重新啟動的圍堵政策不能不有所更張。透過一連串雙邊或多邊同盟來建構圍堵網依舊是主要途徑，但變化有二：首先是美國對盟邦政策配合之依賴度更高，這點在美歐或美日安全關係上可謂展露無遺，後者例如 2015 年的新防衛指針便是；其次，相較蘇聯在地緣政治上被限縮在歐亞大陸內側，擁有近兩萬公里海岸線且直接面對西太平洋的中國，既具備更高之向外穿透潛力，加以圍堵之難度更高，也迫使美國在傳統東（西太平洋島鏈）、西（北約組織）兩道防線之外，必須同時建構一道新的南方（印度洋）防線，由此，印度的重

要性乃自然浮現，例如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洛克利爾（Samuel Locklear）便曾創「印亞太」（Indo-Asia-Pacific）一詞，來突出印度當前的區域重要性，2018年5月將原有「太平洋司令部」改稱「印太司令部」亦是一例。印太司令戴維森（Philip Davidson）也在2020年3月將一份新的「印太戰爭概念」（Indo-Pacific Warfighting Concept）報告提交國會審議。

事實上，自柯林頓在2000年成為自1970年代以來，也是在新世紀初首位訪問印度的美國總統後，在2004年推動建立美印「全球夥伴關係」並於2006年訪印的小布希總統，則透過達成雙邊《民用核子合作協定》間接承認印度身為「核武大國」的地位交換雙邊關係的實質提升（吳彤、張利華，2009：1-37）；至於歐巴馬總統更在2010年訪印時公開聲稱雙方乃「二十一世紀具決定性且不可或缺的夥伴關係」，甚至明確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拉攏意味十足。於此同時，美國一方面自2009年起邀請日本參與美印聯合演習，在2011年促成三邊戰略對話，試圖將印度與澳洲融入以美日同盟為基軸的西太平洋圍堵網路。相較印度在自冷戰時期乃至後冷戰初期，始終處於美國全球戰略布局邊緣，前述發展或許暗示至少美國有將印度納入其「核心夥伴」之趨勢，尤其隨著中國愈來愈成為華府假想敵，印度戰略地位之突出乃可以想見。

在莫迪（Narendra Modi）於2014年當選印度總理後，儘管雙方先前略有齟齬（美國自2005年以來長期拒發簽證給莫迪），歐巴馬仍陸續派遣國防部長、國務卿和商務部長密集訪印修補關係，並於莫迪9月訪美時與其共同聯名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題為〈復興中的美印二十一世紀夥伴關係〉（A Renewed U.S.-India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一文，目的自然是希望推動雙邊互動朝正向發展。隨著雙方在2016年簽署《後勤支援協定》及《通訊相容與安全協定》（COMCASA），2017年川普回應由日本首倡、印度跟進之「自由開放之印度太平洋」概念，2019年6月正式提出《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ic Report），同年底更首度展開代號「老虎凱旋」之美印三軍聯合演習，軍事互動之升溫發展值得關注。

三、中印關係：撬動全球平衡之新槓桿

無庸置疑，美國拉攏印度的目標之一，既為了強化其圍堵中國大陸的戰略布局，事實上也欲利用不無磨擦的中印關係以達「借力使力」效果。不過，情況顯然沒有白宮想像中那麼單純。

客觀地說，中印之間確實存在矛盾。例如在中國於 2011 年正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西方不僅關注它何時將繼續超越美國的問題，《經濟學人》也在同年以中印即將進入「世紀之爭」（Contest of a Century）作為封面主題，討論兩者對形塑未來世界政治秩序的影響（The Economist, 2010）。事實上，美國國家情報理事會早在 2004 年便在名為《描繪全球未來》的研究報告中，透過所謂「達沃斯世界」（Davos World）的預言式場景，描繪由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印兩國）接手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可能性（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04）。如同眾所周知，中國和印度不僅是當前全球成長最快的兩個發展經濟體，人口相加達到全球總數四成以上，雙方在合作方面亦非全無進展，例如在 2003 與 2007 年舉行史上首度海上與陸上聯合演習便是例證，但此一雙邊關係自新世紀以來仍顯然衝突大於合作。

儘管如此，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既有架構的出發點上，2009 年正式登場的金磚國家高峰會（由俄羅斯、中國大陸、印度、巴西與南非共同參與）既提供了不同的思考點與契機，中國大陸也藉此向印度發起一連串友善攻勢，包括溫家寶在 2010 年訪印時決定開通雙邊總理熱線，2011 年又推動召開首屆「中印戰略經濟對話」所暗示者，無論中國大陸或印度其實都很瞭解，兩國目前在國際舞台中所受到的高度關注既來自於其龐大的經濟潛力，至於能否將此股潛力化為實際的經濟能量，亦是其各自未來發展所繫。例如習近平在 2014 年訪印之前所稱「世界工廠和世界辦公室的強強聯合將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或許並非僅僅是中國大陸的單方面想像而已；可以想見，一旦中印互動主軸從衝突轉為以合作為主，其總和勢將撼動整個世界結構。

無論自十九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次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平衡秩序，基本上都傾向以「西方」（歐美）為核心，藉由「海權」控制歐亞大陸之地緣格局，儘

管中印合作目前仍是「想像多於現實」，雙方分列全球經濟體第 2 與第 5 名，合佔全球人口 28%、陸地面積 8% 與 GDP 總量 20%，倘若真有合作可能性，對當前全球權力格局勢必帶來衝擊。

貳、中國之歐亞戰略布局及其影響

一、中共之一帶一路戰略宣示

相較於一般觀察中國對亞洲外交政策時，通常聚焦於「亞太」或「東亞」地區，實則透過「新絲綢之路」或「一帶一路」等新概念，中國已將其戰略布局從歐亞大陸邊緣擴及其心臟地帶，甚至愈來愈趨向與俄羅斯聯手構建新的歐亞大戰略（蔡東杰，2015：17-30）；例如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於 2013 年 4 月針對中國與中亞關係舉行的聽證會當中，小組委員會主席羅拉巴查（Dana Rohrabacher）便認為，近期中國的大量資本輸出（特別是來自國有企業）將很可能在控制中亞經濟之後，從而使其得以對該地區之政治發展施加重大影響；儘管有人認為中國在此地區不過在運用某種「空城計」罷了，因此建議美國可有也應有更積極作為（Scobell, et al, 2014），不過，更多人還是從正面肯定中國崛起角度，強調美國必須在亞太地區有所作為，否則將難以面對既有地位所受挑戰。

針對近年來愈來愈密切之中國與中亞互動關係，其引發的後續討論包括：中國對中亞地區的政策內涵究竟為何？由此反映的大戰略安排可能為何？此一政策將帶來何種地緣政治影響？其他國家的可能反應又為何？就在前述熱烈討論之背景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 年 9 月對土庫曼、哈薩克、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等 4 個中亞國家進行國事訪問，這也是他在該年 3 月正式就任國家主席以來第三次出訪。根據中國官方媒體的說明，習近平前兩次出訪，「旨在加強中俄全方位戰略協作，探索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加快金磚國家合作步伐，傳承大陸與非洲、拉美國家的友好合作」，此次出訪則「著眼推動解決世界經濟面對的挑戰，深化上海合作組織的合作，並提升與中亞國家關係水準」，也是「構建中國全方位外交格局的又一重要步驟」（蔡東杰，2013：13-18）。

在習近平於此次出訪期間，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設所謂「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之後，相關概念隨即引發熱烈討論，其後，中共「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在 2015 年 2 月召開並公布了領導小組名單，包括 1 名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2 名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與 2 名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楊晶、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共同參與，規格明顯不低，凸顯中共中央對「一帶一路」建設工作的重視；根據張高麗表示，所謂「一帶一路」在陸上依託國際大通道，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若干國際經濟合作走廊，海上則依託重點港口城市，共同打造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同年 3 月 28 日，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與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白皮書作為政策指導原則，據此，所謂「一帶一路戰略」乃正式啟動（秦玉才，2015：25）。

二、美國之地緣考慮及其回應

中亞在世界地緣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首先，主要因為此一地區位處歐亞大陸腹地，是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所謂的「樞紐地區」和「心臟地帶」（吳征宇，2005：57）再加上擁有包括石油在內的工業革命所需之豐富戰略資源，更使其成為當代新的地緣政治戰場。其次，從大戰略需要來說，中國的基本態度乃預防任何國家將中亞作為遏制其崛起的戰略基地。由於美國在冷戰結束後，試圖透過掌控中亞以控制所謂「世界島」（歐亞大陸），並於 2001 年 911 事件後藉「反恐」之名駐軍阿富汗和中亞（歐巴馬雖於 2014 年「再度」宣示將於 2016 年自阿富汗撤軍，事實上川普政府在 2020 年 2 月 29 日與塔里班政權簽署協議，預計將美國駐軍由 1.3 萬降至 8600 人後，仍未確認最終「全面撤出」時間表），不僅實際上完成了從東亞、東南亞到南亞和中亞的全球性戰略連接，也為中國的周邊環境帶來巨大的戰略壓力。

更甚者，由於應對「中國崛起」乃美國新世紀亞太戰略佈局的思考核心，加上歐巴馬政府上任後明顯更注重亞洲（Pivot to Asia）的「戰略方針」，基於美國持續落實遏制中國崛起戰略所可能發生的衝突潛在性，中國在戰略安排上不僅

需要維持中亞地區的穩定、和平與中立，更希望透過制度化途徑（例如透過上海合作組織與中亞跨國交通網）來鞏固雙邊關係，以藉此來反制美國對中國產生的地緣戰略壓力。傳統基金會研究員柯亨（Ariel Cohen）指出，「中國不僅在政治上試圖透過上海合作組織創造一個歐亞新秩序來抑制美國的軍事能量，事實上，它早已取代美國成為中亞地區貿易與投資的主要來源」（Cohen, 2005: 10）；由此，中國一方面可能拉攏中亞達成區域「稱霸」，甚至未來更有可能與美歐等強權「爭霸」，對此，美國作為既存霸權自然不可能坐視不理。

哈德遜研究所中國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 2015 年新書中指出（Pillsbury, 2015），自尼克森時期以來，中國的長遠戰略目標就是故意讓美國總統和高官做出誤判，以為中國離不開美國支持，但其戰略宗旨是占據全球經濟主導地位，以輸出中國式反民主制度和掠奪型經濟模式。此論點看似個人意見，但確實反映出美國持續高漲的「中國威脅論」。與此對比，中國社會科學院在 2013 年版的《美國藍皮書》曾經以「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為題，2014 年版報告則聲稱美國的「再平衡」戰略乃中國周邊安全四大威脅之一，一方面聚焦「中美關係的第三方因素」，亦指出美國在內部事務壓力下，將更倚賴盟邦力量（黃平、鄭秉文，2014）；於此同時，許多中國學者同樣指出美國很難承認或接受「新型大國關係」。

針對所謂「一帶一路」構想，如同提亞茲（Shannon Tiezzi）指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中國提供了在經濟和外交上「拉近與南亞、中亞和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在內海灣國家關係的機遇」（Tiezzi, 2014），至於下一階段，中國將在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之際密切拉攏巴基斯坦以打通赴印度洋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國和俄羅斯之間存在諸多分歧，雙方在亞太和歐亞地區分別受到美國主導下的圍堵，致使其走向結盟的趨勢日漸明顯；正因如此，為避免失去歐亞主導權，許多人均建議，防止中俄結盟應該成為美國下一階段外交政策重中之重。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國地緣戰略視野雖愈來愈聚焦圍堵中國，以及思考如何回應中俄結盟之影響，不過，如何面對中俄拉攏印度（包括 2002 年啟動三邊外長會議、2008 年起召開金磚峰會、2017 年接納印度加入上合組織等），甚或主動積極拉攏印度（如前段所示之美印關係接近）來抵制或破解可能之地緣格局

變化，顯然都是華府擘劃目標之一。

三、邊界衝突陰影下之中印雙邊互動

總的來說，為解決長期邊界爭端，中印兩國在 1981-87 年間舉行了第一階段 8 輪的副部長級會談，接著在 1988 年拉吉夫·甘地 (Rajev Gandhi) 的「破冰之旅」後，雙方繼續在 1989-2002 年進行第二階段 14 輪磋商，先後於 1993 和 1996 年簽訂了兩份邊界協定，以這些協定以及 2002-03 年領導人互訪達成之共識為基礎，雙方又在 2003 年確定所謂「三步走」戰略，亦即先確立基本指導原則，再達成落實指導原則的框架協定，最後才進行實際劃界，從而將雙方推進到第三階段談判中（層級也提高為部長級），至 2019 年為止已進行了 22 輪會談，但依舊在框架協定部分僵持不下。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 14 個陸地鄰國中，「唯二」還未與中國完成劃界協議的除了印度外，還有不丹，後者也是迄今未與中國建交的鄰國，截至 2019 年共與中國進行 24 輪邊界談判與 9 次專家會議（蔡東杰，2020：158-159），主要是根據 1949 年印度與不丹簽署的條約，使後者幾乎處於附庸國狀態，但 2007 年雙方簽訂的新條約已使不丹表面上獲得獨立的外交權，致使「建交」議題不僅自 2012 年起浮上檯面，不丹在 2018 年的政黨輪替也埋下一個新變數，或許將使中國與不丹的關係出現某種轉折。

儘管如此，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既有架構的出發點上，2009 年正式登場的金磚國家高峰會（由俄羅斯、中國、印度、巴西與南非共同參與）既提供了不同的思考點與契機（Yang, 2011），中國也藉此向印度發起一連串友善攻勢，包括溫家寶在 2010 年訪印時決定開通雙邊總理熱線，不久又推動召開首屆「中印戰略經濟對話」之政策暗示，無論中國或印度其實都很瞭解，兩國目前在國際舞台中受到的高度關注既來自於其龐大的經濟潛力，至於能否將此股潛力化為實際的經濟能量，亦是其各自未來發展所繫。值得注意的是，中印雙方雖自 1975 年以來沒有爆發過大規模衝突，且即便邊境紛爭通常很快便結束，近年來對抗頻率升高仍為不爭事實，尤其在 2017 年洞朗對峙事件後，既意味戰爭絕非不可能，2020 年 5 月中方軍隊進入喀什米爾拉達克地區加勒萬河谷（Galwan Valley）後，雙方雖彼此克制衝突手段與規模，仍顯示邊界問題非但依舊是中印關係「軟肋」，

乃具高度衝突顯在性之導火線議題，甚至可能因此將印度「推向美國」，從而影響美中印三邊關係之發展路徑。

參、印度之中間角色及其影響

一、美中對峙下之印度戰略地位

在小布希政府於 2006 年與印度簽署《民用核子合作協定》，扭轉了兩國自冷戰時期以來的緊張關係後，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 2009 年又於訪印期間簽署數項協議，同意出售印度先進武器系統，並透過太空合作協定為印度衛星採用美國科技鋪平道路，至於歐巴馬總統則不僅在 2010 年公開宣示將支持印度爭取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席次，2015 年又成為首位在任內兩度造訪印度的美國總統。不過，儘管雙方關係看來似乎一直朝正面方向進展，如同傳統基金會南亞專家柯提絲（Lisa Curtis）所言：「很明顯，印度並沒有興趣與美國發展例如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與美國之間的防務同盟關係；它對美國仍存有疑慮，因為後者曾針對印度發展核武採取制裁措施，在對巴基斯坦政策以及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義方面的政策是互相矛盾。」（Curtis, 2015: 25-27）更甚者，美國不但在 2002 年莫迪所屬古吉拉特邦爆發反穆斯林暴動後，自 2005 年起長期拒絕他入境與申請簽證，2013 年印度駐紐約副總領事被逮捕事件更一度使兩國關係降至冰點。當然，為了建構圍堵中國的「南部防線」或「印度洋防線」，歐巴馬試圖以推薦印度加入由 48 國組成的「核子供應國集團」（Nuclear Suppliers Group）來表達某種善意，印度則以解禁美國公司在印度建造核電站回應。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歐巴馬結束 2015 年出訪印一周後，中國、印度與俄羅斯外長在同年 2 月齊聚北京參加自 2002 年以來（2005 年首度獨立召開）第 13 次三邊外長會談（至 2019 年共召開過 16 次），誓言將共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穩定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與多極化世界」，並推動建立三邊「亞太事務磋商機制」（胡逢瑛、吳非，2016：144）。正如眾所周知，儘管彼此存在矛盾糾葛（中國是唯一反對印度「入常」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被稱為 RIC 的中

印俄三國合佔全球 GDP 二成以上與總人口 40%，且同為 2009 年成立之金磚集團（BRICS）的創始國，未來互動既動見觀瞻，印度的政策走向與戰略選擇也格外引人注目。

無論如何，基於 2018 年後美中對峙態勢明顯升高，一方面莫迪在 2017 與 2019 年兩度造訪美國，希望藉此從中取利，川普在 2020 年訪印時也與其簽署 30 億美元軍售協定，並敦促印度將美國視為「首要防務夥伴」；不過，畢竟美印之間也有貿易逆差問題（雖然 240 億總額遠小於美中的 4300 億美元），加上複雜之南亞地緣糾葛（美國也必須利用巴基斯坦來制衡阿富汗），此一雙邊互動仍存在變數。

二、美中印戰略三角之可能發展

由前述可知，美中印關係正所謂「各有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美國希望如同冷戰後期「聯中制蘇」一般，再次透過「聯印制中」來玩權力平衡遊戲；中國大陸方面則試圖在消極地破局之餘，也嘗試積極地「聯印抗美」來轉動地緣政治格局；至於印度，或許期盼從略偏美國的「等距外交」出發，見機行事或見招拆招地迂迴前進。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拉奧（Rao）政府時期也曾啟動某種「北望」（Look North）政策，試圖與中亞地區接觸（Kavalski, 2010: 41-60），畢竟地緣鄰接性有限，進展也不大，不過，從中國於 2013 年啟動與印度之間關於中亞議題的對話性機制，顯見對後者仍有忌憚，尤其在 2015 年「一帶一路」逐漸成形後，印度態度與中印關係之發展更具某種關鍵性。

從戰略三角理論模式來看（Dittmer, 1981: 485-516），由於美國與中國自 2018 年爆發貿易戰，2019 年底以來之 COVID-19 疫情又導致雙方對立持續升高，致使近期之美中印三角關係正擺盪在「羅曼蒂克型」（美中關係緊張，但各自與印度保持正面互動）與可能的「結婚型」（美印關係穩定，但美中與中印關係皆緊張）2 個模式之間，這也暗示若非印度擔任「樞紐」，便是中國將淪為「孤雛」。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7 年美國公布了「印太戰略」方向並於 2019 年陳述具體戰略規劃後，印度隨即在 2018 年將「東望」（Look East）強化為「東進」（Act East）政策，且莫迪在 2018 年香格里拉對話中進一步指出，印度太平洋應是「自

由，開放和包容的」，建立在「所有人的同意的規則和規範之下，並非少數的力量」，印度外交部據此於 2019 年設立新的「印度太平洋司」，作為政策整合單位 (Darbey, 2020: 48)，根據前述可見，印度似乎嘗試讓自己成為具搖擺性的「第三方」，設法維持表面上的中立，至於能否落實則有賴天時、地利與人和的配合；換言之，印度看來並不完全「扈從」美國戰略，也不願公開「抗衡」中國（畢竟對其貿易依賴度甚高），而是希望在「積極避險」原則下去形塑自身的樞紐地位。

肆、結論

川普在 2020 年 2 月的印度之行，乃是他與莫迪自 2017 年 6 月以來的第五次會晤，兩人雖都有「喜歡作秀、傾向民粹與保護主義」的共同行為特徵，真正連接華盛頓和新德里的一個重要紐帶仍是共同遏制中國的擴張，尤其是北京的「一帶一路」戰略之潛在影響，以及前述布局以「珍珠鍊」樣態圍繞印度次大陸展現之地緣威脅感 (Thaliyakkattil, 2019)；儘管如此，相較美中互動現階段「競爭遠高於合作」，印度與中國之間則存在某種「複雜競合」關係，地緣鄰接性帶來不可避免之摩擦與猜忌，巴基斯坦尤其是衝突引信，至於雙方在經濟上雖依舊具合作空間，如同印度之中國研究學者謝鋼 (Srikanth Kondapali) 指出，莫迪和習近平「聊很多，卻甚麼都沒有說」，或許是中印交流現狀之最佳註解，儘管印度官方宣稱中印互動已經從 2018 年「武漢精神」(Wuhan Spirit) 走向 2019 年的「清奈連結」(Chennai Connect)，實則雙邊關係不僅沒有向前走，甚至只能努力避免往後退。

進一步來說，無論從美中印三角互動的任一對雙邊關係看來，如同本文分析一般，都存在著正反俱呈之不確定性；至於何以會如此複雜之原因，固然與各自利益盤算與當前國際結構格局特徵有關，或許地緣政治角度提供之視野，也可以讓我們的觀察與思考獲致重要補充。可以這麼說，目前美中各自操作著不同地緣視角之戰略布局，印度則因位於「利益重疊區」暫時呈現左右逢源跡象，從而亦使其獲致一定操作空間，未來發展有待追蹤分析。

參考文獻

- Brown, Stuart S. Brown (2013). *The Future of US Global Power: Delusions of Declin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ohen, Ariel (2005). *Eurasia in Balance: The US and the Regional Power Shift*.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 Curtis, Lisa (2015). "US-India Relations: Are They Still Strategic?" In P.P. Shukla (ed.), *India-US Partnership: Asian Challenges & Beyond* (pp. 19-28). New Delhi: Wisdom Tree.
- Darbey, Abhishek Kumar (2020)。〈印度視角下的印太戰略〉，〈歐亞研究〉，第11期，頁41-50。
- Dittmer, Lowell (1981).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pp. 485-516.
- Howorth, Jolyon (2015).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Rebalance toward Asia: European Security and NATO." In Hugo Meijer (ed.),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US Rebalance toward Asia* (pp. 197-222).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Kavalski, Emilian (2010). "An Elephant in a China Shop? India's Look North to Central Asia: Seeing Only China." In Marlene Laruelle, Jean-Francois Huchet, Sebastien Peyrouse, and Bayram Balci (eds.), *China and India in Central Asia: A New "Great Game"?* (pp. 41-6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Lachmann, Richard (2011). "The Roots of American Decline." *Contexts*, Vol. 10, No. 1, pp. 44-49.
-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04).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December. 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Global%20Trends_Mapping%20the%20Global%20Future%202020%20Project.pdf (accessed: July 4, 2020)
- Pillsbury, Michael (2015).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 Scobell, Andrew, et al (2014). *China's Strategy toward South and Central Asia: An*

- Empty Fortress*. Santa Monica: RAND.
- Thaliyakkattil, Srikanth (2019). *China's Achilles' Hee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Indian Discontents*.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 The Economist (2010). "China and India: Contest of a Century." *The Economist*, August 19.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0/08/19/contest-of-the-century> (accessed: July 4, 2020)
- Tiezzi, Shannon (2014). "The New Silk Road: China's Marshall Plan?" *The Diplomat*, November 6. <https://thediplomat.com/2014/11/the-new-silk-road-chinas-marshall-plan/> (accessed: July 4, 2020)
- US Army (2014). *The US Army Operating Concept: Win in a Complex World, 2020-2040*, TRADOC Pamphlet 525-3-1, October 7. <https://apps.dtic.mil/dtic/tr/fulltext/u2/a611359.pdf> (accessed: July 3, 2020)
- White House (2020).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0.20.pdf> (accessed: July 4, 2020).
- Woodward, Jude (2017). *The US vs. China: Asia's New Cold Wa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Yang, Li (ed.) (2011). *BRICs and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Considerations on the BRICs Summit of Think Tanks in Brasilia*. Reading: Paths International Ltd.
- 中國日報 (2014) 。〈傅瑩：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需要雙方都能妥協〉，《中國日報》，8月6日。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4-08/06/content_18260992.htm。2020/07/04。
- 王高成 (2018)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內涵與影響〉，《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1期，頁1-7。
- 王高成、王信力 (2012) 。〈東亞權力變遷與美中關係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39期，頁41-62。
- 吳彤、張利華 (2009) 。〈美國與印度進行核合作的動因〉，《國際政治科學》，

第 4 期，頁 1-37。

吳征宇（2005）。〈重新認識心臟地帶理論及其戰略涵義〉，《現代國際關係》，第 3 期，頁 55-61。

柳惠千（2020）。《歐巴馬時期的美中權力競逐》。台北：獨立作家。

胡逢瑛、吳非（2016）。《俄羅斯公共外交與地緣政治》。台北：獨立作家。

秦玉才（主編）（2015）。《一帶一路讀本》。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黃平（主編）（2013）。《美國藍皮書 201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黃平、鄭秉文（主編）（2014）。《美國藍皮書 201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蔡明彥（2017）。〈中國在南海的強勢外交與美中戰略角力〉，《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3 卷，第 1 期，頁 37-54。

蔡東杰（2013）。〈近期習近期出訪中亞地區之戰略意義〉，《展望與探索》，第 11 卷，第 10 期，頁 13-18。

蔡東杰（2015）。〈近期中國對亞洲外交政策及其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特集 001，頁 17-30。

蔡東杰（2020）。《當代中國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Development of US-China-India Triple Relations: View of Geopolitics

Wei-Kuang Hsu*, Tung-Chieh Tsai**

Abstract

Since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the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al attract more and more geopolitical attentions due to US's active global strategy, especially the "Pivot to Asia" policy in Obama period. Furthermore, US tried to draw India over to her side because China's launched the so-call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BRI) since 2013-14. In this paper, we'll focus on the sensitive geopolitical framework among US, China and India around South Asia, and try to analyze their possible interactions through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pproach.

Keywords: BRI, US-China-India Relations, geopolitics, strategic triangle

* Dr. Hsu is Chief of Veterans Service Office in Miaoli County. He has got his Ph. D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His area of specialization includ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ast Asian security, and US Foreign Policy.

** Prof. Tsai is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ean of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Director at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and Center for Comprehensive Japan and Korea Studies in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He has got his Ph. D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is area of specialization includ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ast Asian studi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Cross-Strait Issues.

中國大陸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研究*

Research on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陳銘聰**

Chen Ming-Tsung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0.12 第五期，頁 41-68。

** 陳銘聰，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中國大陸並未發生像西方國家那樣經歷從農民向市民的職業、地域和身份同步轉變，而是經歷從農民到農民工、再到市民身份的「中國路徑」。中國大陸農民工市民化議題，就是解決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固定居住，享有平等市民權益等問題，而這些問題根源於 1958 年開始實施戶籍制度，所有人民被分為「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兩大類，分別屬於城市和農村，並嚴格限制人民遷徙。戶籍制度被認為是農民工市民化的核心障礙，戶籍改革就成為推動農民工市民化的必然要求。為了讓在已經在城市生活和穩定就業的農民工實現市民化，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積極採取相應措施，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逐步放寬城市落戶條件，從制度上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實現城鄉居民平等待遇。本文認為，農民工落戶有其風險考量，土地政策已經成為落戶的關鍵，因此，最根本的解決方式，就是推動統一的戶籍登記制度，使戶籍跟各項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脫鉤，戶籍只是登記居住地的作用，不再有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的區別，才是戶籍制度改革的最終目標。

關鍵字：農民工、市民化、戶籍制度、落戶、城鄉二元結構

壹、前言

中共當局¹過去為了發展工業，長期推行「以農養工」（韓永濤、欒雪飛，2012：109-112）的政策，並採取嚴格的戶籍制度²，使得農民工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戶籍卻在農村，無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的特殊現象。大量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對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但是無法享有與城市居民一樣的權益，形成對農民工的一種身份歧視，引發大量農民工的不滿，並逐漸成為中共當局的執政隱患。戶籍制度雖然是造成城鄉不平等待遇的主要因素，更為深遠的影響，它限制城鄉間的人口流動，城鄉間發展的不均衡，助長城鄉差距逐漸擴大。

中共十八大以後，國務院要求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拉開「戶籍制度」（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改革的序幕，並在2014年提出「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³」（田雪原，2013：5），將在2020年實現一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落戶。中共十九大以後，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⁴」市民化。

本文以「戶籍制度」為切入點，結合國家統計局所公佈《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的相關數據，發現在邁向「國家新型城鎮化」的道路中，戶籍制度被認為是城鄉發展阻隔、資源配置不公、福利待遇缺失的制度性障礙，造成農民工身份歧視和地位差別的罪魁禍首，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成為必須改革的核心制度（朱廣

1 為了行文方便，若涉及政府層面的則稱「中共當局」，若涉及國家層面的則稱「中國大陸」，合先敘明。

2 在許多文獻，也有稱呼為「戶口制度」（hukou system）。

3 2014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該《規劃》分規劃背景、指導思想和發展目標、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優化城鎮化佈局和形態、提高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改革完善城鎮化發展體制機制、規劃實施8篇。

4 所謂農業人口的轉移，就是指農業人口向農業內部各系統的轉移，如種植業轉向養殖業；同時也是指向農業系統外的其他部門和行業的轉移。它與工業、城鎮化和農業機械化緊密相聯。

琴，2017：1-3）。為此，中共當局也注意到此問題的嚴重性，開始逐步為農民工落戶城市敞開大門，其中，大城市放寬落戶條件，而中小城市戶籍則全面放開。不過，在實踐中卻發現農民工落戶積極性不高，甚至出現已經成為城市戶籍的又積極轉為農村戶籍的特殊現象。究竟農民工落戶選擇與戶籍制度之間存在怎樣的矛盾之處，也是中國大陸農民工市民化的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貳、中國大陸戶籍制度的問題分析

一、戶籍制度與農民工的由來

戶籍制度始於 1958 年中共當局所頒佈的《戶籍登記條例》，該條例嚴格管理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七項人口登記制度。所有國民被基本分為「城市戶籍」和「農業戶籍」兩大類⁵，分別屬於城市和農村，在過去是作為獲得國家糧食配給的資格（田錫全，2019：71-81）。每個國民只能在一個居住地登記戶籍，若在城市登記，單位是一個家庭，若在農村登記，單位是公社、村莊或國營農場。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農村居民獲得城市戶籍的主要管道是國有企業的招聘、獲得大學學位或是在體育或其他獲得科學成就等（Liu, 2005: 135-136）。因此，在戶籍制度下的城鄉流動其實是戶籍轉換過程，更是資源分配問題。

「農民工」起源於 1978 年中共當局實行改革開放，並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開始大量湧入城市，才漸漸出現的新群體（白永秀、劉盼，2019：5-14）。農民工流動到城市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跨省流動，隨著沿海地區工商業的快速發展和勞動力的不足，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遷移東部經濟發達地區，這種人口流動也稱為「民工潮」（崔怡，2015：229）；另外一類是農民到省內快速發展的城市，一般為省會城市（萬習剛，2010：26）。截止 2019 年底，農民工總量達到 29,077 萬人，比 2018 年增加

5 也有稱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

241 萬人，增長 0.8%。其中，本地農民工⁶11,652 萬人，比 2018 年增加 82 萬人，增長 0.7%；外出農民工⁷17,425 萬人，比 2018 年增加 159 萬人，增長 0.9%，詳情參見下表一。

表一、2018-2019 年農民工的總量表

單位：萬人、%

	2018 年	2019 年	增量	增長
合計	28,836	29,077	241	0.8
本地農民工	11,570	11,652	82	0.7
外地農民工	17,266	17,425	159	0.9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在外出農民工中，年末在城市居住的進城農民工 13,500 萬人，與 2018 年基本持平。在外出農民工中，在省內就業的農民工 9,917 萬人，比 2018 年增加 245 萬人，增長 2.5%；跨省流動農民工 7,508 萬人，比 2018 年減少 86 萬人，下降 1.1%。省內就業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的 56.9%，所占比重比 2018 年提高 0.9%。分地區看，除東北地區省內就業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的比重比 2018 年下降 3.4% 以外，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省內就業農民工占比分別比 2018 年提高 0.1%、1.4% 和 1.2%，詳情參見下表二。

6 本地農民工，系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內從業的農民工。

7 外出農民工，系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農民工。

表二、2019 年外出農民工地區分佈及構成

單位：萬人、%

按輸出地分	外出農民工總量			構成		
	外出			外出		
	農民工	跨省流動	省內流動	農民工	跨省流動	省內流動
合計	17,425	7,508	9,917	100.0	43.1	56.9
東部地區 ⁸	4,792	821	3,971	100.0	17.1	82.9
中部地區 ⁹	6,427	3,802	2,625	100.0	59.2	40.8
西部地區 ¹⁰	5,555	2,691	2,864	100.0	48.4	51.6
東北地區 ¹¹	651	194	457	100.0	29.8	70.2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二、當前農民工的基本特徵

從職業來看，農民工所從事的並非農業工作，從戶籍身份來看，他們的身份是農民，因此，有形容農民工是「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家屬在農村；收入在城市，積累在農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農村」（短評，2014：80）。正是這種身份與職業分離的戶籍制度，使得農民工從農業勞動者階層中分離出來，成為「人戶分離」的社會特殊群體（林文軒，2016：176）。根據《2019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當前農民工具有以下特徵：

- 8 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 10 個省（市）。
- 9 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6 省。
- 10 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 12 個省（自治區）。
- 11 東北地區：遼寧、吉林、黑龍江 3 個省。

（一）女性和有配偶的農民工比重均提高

在全部農民工中，男性占 64.9%，女性占 35.1%。女性比 2018 年提高 0.3%，有配偶的比 2018 年提高 0.5%。其中，外出農民工中女性占 30.7%，比 2018 年下降 0.1%；本地農民工中女性占 39.4%，比 2018 年提高 0.8%。在全部農民工中，未婚的占 16.7%，有配偶的占 80.2%，喪偶或離婚的占 3.1%。其中，外出農民工有配偶的占 68.8%，比 2018 年提高 0.7%；本地農民工有配偶的占 91.3%，提高 0.5%。由此可見，無論是外出或本地農民工，有配偶的都佔大多數，若無法解決子女的教育問題，留守兒童依舊是社會問題。

（二）老一代農民工比重繼續提高

2019 年農民工平均年齡為 40.8 歲，比 2018 年提高 0.6 歲。新生代農民工（40 歲及以下）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 50.6%，比 2018 年少了 0.4%，不過仍然占農民工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31-40 歲占 25.5%；21-30 歲占 23.1%；16-20 歲占 2.0%。老一代農民工（40 歲以上）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 49.4%。其中，41-50 歲占 24.8%，比 2018 年少 0.7%，但是 50 歲以上占 24.6%，比 2018 年提高 2.2%，再比較近五年的數據，比重則是逐年提高，可見農民工逐漸老齡化。

再從就業地區的年齡分佈來看，本地農民工平均年齡為 45.5 歲，其中 40 歲以下比重為 33.9%，50 歲以上所比重為 35.9%；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 36 歲，40 歲以下比重為 67.8%，50 歲以上比重為 13%。由此可見，留在本地區的農民工一般都為老一代農民工，而外出的農民工則以新生代為主。

（三）大專及以上學歷農民工占比略有提高

在全部農民工中，從未上過學的占 1%，小學程度的占 15.3%，初中程度的占 56%，高中程度的占 16.6%，大專及以上的占 11.1%。由此可見，初中程度的農民工佔最大多數，不過大專及以上程度的農民工所佔比例，2019 年比 2018 年提高 0.2%。其中，在外出農民工中，大專及以上程度的占 14.8%，比 2018 年提高 1%；在本地農民工中，大專及以上程度的占 7.6%，下降 0.5%。

三、戶籍制度造成的社會現象

中國大陸的戶籍制度是以「城市」和「農村」為基礎所進行分類，形成中國特色的「城鄉二元結構」（過子庸，2019：167）。當時，城市對農民工落戶嚴格限制，但是城市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又是建立在戶籍制度的基礎上，導致大量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期間，由於無權享受城市公共服務，戶籍制度弊病越發明顯（郭琳琳、楊茜、王海嘯，2012：26）。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配給制度的廢除，農民工開始取得獲得城市戶籍的機會，但是每個城市戶籍取得的條件限制不同，普遍來說，取得城市戶籍的過程依舊困難重重、阻礙巨大（Chan and Zhang, 1999: 845-846）。

自戶籍制度施行以來，由於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的特殊二元社會結構，造成以下的社會現象：

第一個現象是「農轉非」的控制困難和弊病叢生。農轉非是指計劃經濟時代的一種戶籍制度。農，指農業；非，指非農業生產。農轉非的組成人群一般是鄉鎮公務員、工勤人員等。由於正式的城市戶籍身份意味著城市特權和機會，幾乎在任何時候都有很大的需求。農轉非是指起源於八十年代初期的國家改革開放後城市發展和規劃要把本來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以劃撥部分土地和商業網點建設和各種保障政策作為安置，辦成的性質為集體所有制的企業，所轉變成為了第三產業勞動的人口，這是國家給予這部分人員生活和生產等各方面的政策性保障。

當時，許多中央部委和部門有權制定政策規定農轉非的條件，不過，出於自身部門利益，這些部門往往制定有利於自己部門的員工提供「農轉非」機會的政策（馬大龍，2017：22-23）。但是，中央政府（主要是國務院、國家計劃委員會¹²）並沒有真正放開每一類的限額控制，這就造成符合農轉非條件的人數與實際開放人數之間存在落差。再者，戶籍轉換過程幾乎沒有透明度，甚至還存在戶籍配額的爭奪，經常出現符合條件卻無法轉換戶籍的現象發生（Chan and Zhang, 1999: 842-8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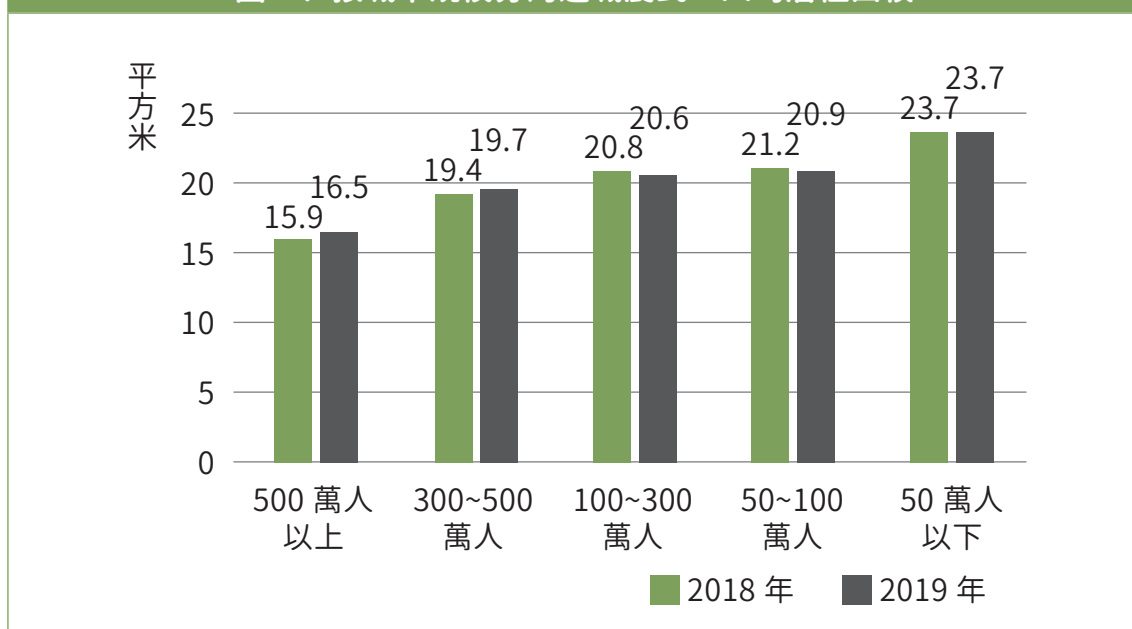
12 1998年3月，國家計劃委員會被更名為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

第二個現象是新的社會經濟鴻溝。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流動人口占主導地位的上升，是市場經濟迅速擴張和農轉非受到嚴格控制的結果。經濟改革雖然增加了農村人口在城市工作的可能性，並有一些合法取得戶籍的機會，但是只限於部分小城市。對他們來說，取得城市戶籍僅是極少數的富農或那些有高學歷的特權，而他們最多只是取得臨時居民的身分，但並沒有獲得太多城市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權利（Chan and Zhang, 1999: 843）。長期下來，在許多城市出現農業戶籍和城市戶籍兩極化的社會結構，一方面是城市居民的工作、住房、教育、食品、醫療受到國家的保護；另一方面是在城市從事低薪的「三 D」（Dirty, Difficult, Dangerous）工作的農民工（Solinger, 1995: 113-139）。

根據《2019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當前農民工月均收入 3,962 元，比 2018 年增加 241 元，增長 6.5%，農民工集中就業的六大行業月均收入均穩定增長。其中，從事製造業農民工月均收入 3,958 元，比 2018 年增加 226 元，增長 6.1%；從事建築業農民工月均收入 4,567 元，比 2018 年增加 358 元，增長 8.5%；從事批發和零售業農民工月均收入 3,472 元，比 2018 年增加 209 元，增長 6.4%；從事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農民工月均收入 4,667 元，比 2018 年增加 322 元，增長 7.4%；從事住宿餐飲業農民工月均收入 3,289 元，比 2018 年增加 141 元，增長 4.5%；從事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農民工月均收入 3,337 元，比 2018 年增加 135 元，增長 4.2%。

第三個現象是在城市定居困難。農民工必須已經在城市就業、定居和安家置業才稱得上市民化。根據《2019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人均居住面積 20.4 平方米，比 2018 年提高 0.2 平方米。其中，在 500 萬人以上城市人均居住面積增加較多，由 2018 年的 15.9 平方米提高到 16.5 平方米，提高 0.6 平方米；在 300-500 萬人口城市人均居住面積為 19.7 平方米，比 2018 年提高 0.3 平方米。不過，100-300 萬人口城市人均居住面積為 20.6 平方米，比 2018 年降低 0.2 平方米；在 50-100 萬人口城市人均居住面積為 20.9 平方米，比 2018 年降低 0.3 平方米。另外，50 萬人以下城市則和 2018 一樣，維持在 23.7 平方米。詳情參見下圖一。

圖一、按城市規模分的進城農民工人均居住面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對農民工而言，若如果不能在城市定居和安家置業，很難有歸屬感，此時城市僅是作為其工作和暫時的棲身之地，最終還是會如候鳥一樣返回農村。決定農民工能否在城市定居的因素，最主要的是有沒有穩定的住所和養老所需的費用。在 2019 年，中國大陸戶籍人口城市化率為 44.38%，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為 60.60%，還有 16.22% 差距，造成這個現象是因為約 1.7 億外出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被統計為城市常住人口。如果在城市常住的農民工不能在城市定居，他們將會在年老時或更早返回鄉村，未來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就會不升反降。

第四個現象是留守兒童問題。留守兒童是中國社會的另一個特殊群體，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無法與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滿十六周歲農村戶籍未成年人。農民工為了生計外出打工，用勞動或智慧獲得家庭收入，並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作出重要貢獻，但他們的子女卻留在了農村家裡。這些本應是父母一起生活的兒童變成一個特殊的弱勢群體，成為留守兒童。近年來，留守兒童問題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因為他們正處於成長發育

的關鍵時期，成長中缺少父母情感上的關注和呵護，心理發展的異常，極易產生思想和價值的偏離，不少人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

四、城鄉的不平等待遇

長期以來，這樣特殊的戶籍制度，嚴格限制農民工在城市落戶，他們是農村人口卻不居住於農村，形成嚴重城鄉分割的社會結構。農民工生活在城市但不能落戶城市，除了無法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住房、醫療、就業、就學與社會保障等各種權益外，更需繳納衛生管理費、治安管理費等諸多城市居民無需繳納的額外開支，使得農民工遭受諸多不公平的待遇與歧視（Liu, 2005: 136）。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的報告顯示，目前與戶籍掛鉤的個人權利有二十多項，其中涉及就業、教育、社會保障、計劃生育等各個方面。

以社會保險（簡稱社保）為例，該制度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不過一般僅嚴格地適用於外資，一般內資企業在地方官員的彈性執法下，能免則免，造成農民工的總體社保覆蓋率很低。根據學者引用的官方資料顯示，在 2006 年，四種社保項目（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在農民工的覆蓋率，分別只有 26.6%、26.2%、15.3%、32.5%，而在城市居民的覆蓋率估計值分別是：36.7%、27.8%、23.7%、15.3%（吳介民，2019：244）。乍看之下，除養老保險外，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社保覆蓋率差異並不大，甚至在工傷項目方面農民工的覆蓋率更高。但是，上述的數據不能這樣解讀，理由如下：第一，當時許多農民工並沒有和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導致農民工的社保涵蓋率一直低下。第二，資料顯示的是平均情況，政府管得比較嚴的是外資企業，參保率一般比較高，內資企業的社保涵蓋率通常都很低。第三，在大型城市，農民工所參加的專門為農民工設計的非典型社保，以上海市為例，針對外來從業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上海市政府就實施綜合保險（李娜、尚昌武、張雅丹，2009：69-70），即「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王小蓉，2009：64）。

以社保中的醫療保險為例，中共當局雖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建立城市居民的醫療保險，但農民工基本上都無法參加醫療保險，無能力負擔大醫院的高額醫藥費，一旦生病只能自行買藥醫治。

再以社保中的養老保險為例，引用學者的資料來看，農民工擁有養老保險的占 16.3%，城市居民占 67.3%；在失業保險方面，農民工擁有失業保險的占 6.2%，城市居民占 44.5%；在醫療保險方面，農民工能報銷部分或全部醫療的僅占 28.4%，城市居民則占 66.3%，詳情參見下表三。

表三、農民工和城市居民的社保福利待遇比較

社會保險	農民工 N=769	城市居民 N=1152	X2	P
養老保險	16.3	67.3	485.72	.000
失業保險	6.2	44.5	365.98	.000
醫療保險	28.4	66.3	307.72	.000

資料來源：王小蓉（2009）。

再以子女教育問題為例，城市教育資源作為一種稀缺資源，當地政府優先保留給城市居民，針對未能落戶的農民工則設置不同程度制度障礙，農民工的子女無法進入城市公立學校就學，僅能接受體制外的教育，也是一個非常困擾的問題（黃德北，2006：130-131）。導致一些農民工由於子女無法在城市接受教育而選擇返鄉，成為新失業人群。

更有甚者，父母為了生計依然留在城市，而未成年子女回到農村入學，無形中造成更多的留守兒童，影響親情關係的培養，為日後的社會問題埋下隱患。從表面來看，農民工遷移城市為了更好就業機會、獲得更高報酬等經濟利益，但是中國傳統「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思想影響下，父母對子女利益的考量有著根深蒂固的傳統，而農民工最為子女考量的就是他們的教育。當今中國社會流動性差，教育成為打破階層固化，實現階層流動的重要途徑。但是教育水準和教學品質越來越取決於出生和出生地，原因是城鄉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城市和農村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差距越來越大，追逐城市優質的教育資源，成為農民工

落戶決策的重中之重。

根據《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約50.9%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城市上學面臨一些問題，在義務教育階段，約34.2%面臨本地升學難，約28.9%面臨費用高的問題，這比2018年提高7.5%和1.7%。在高考方面，隨遷子女無法在本地參加高考所占比重增加明顯，比2018年提高4.3%至14.3%。就地區分佈來看，東部地區農民工隨遷子女存在升學難、費用高、無法在本地參加高考問題，所占比重分別為44.9%、30.1%和21.3%，分別比2018年提高14.1%、3.6%和7.8%，顯著高於其他地區。另外，城市規模越大，升學、費用和高考的問題就越突出，在5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這些問題就更加顯著。

最後以高考¹³名額分配為例，每年的高考雖然是全國性的，但高考的錄取標準是針對各省的，擁有本地戶籍的人的錄取標準明顯低於外地人。此外，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認為戶籍對他們及下一代的發展非常重要，但他們願意承擔生活成本高壓力的，但有前途的工作，以保證將來在大城市有一個戶籍，為他們的子女獲得更高品質教育的機會（Liu, 2005: 154-156）。由此可見，戶籍制度所帶來的差別待遇是相當深遠的。

參、中國大陸戶籍制度改革的進程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沒有戶籍制度，人口的遷徙是自由的選擇，人口的自由流動也促進了資源優化配路和社會均衡發展，推動了城市化進程。而因為戶籍制度，無論是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還是中小城市人口進入大城市，都面臨著落戶門檻。落戶往往是享有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前提，這也成為中國大陸城市化進一步提升的障礙。中國大陸的戶籍制度經歷嚴格限制期、半開放期，如今的戶籍制度改革朝著打破城鄉二元格局，實現真正的城市化。

本文根據相關文獻梳理，中國大陸戶籍制度改革的歷程，按照時間大致上可

13 高考全稱是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是中國大陸合格的高中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力的考生參加的選拔性考試，類似臺灣過去的大學聯考。

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暫住證制度，作為當地政府管理農民工的依據。第二個階段是特殊戶籍制度的安排，主要是藍印戶口和藍卡。第三個階段是放寬戶籍限制，主要是透過居住證制度，讓農民工可享受當地居民的待遇。第四個階段是新型戶籍制度，主要是透過放開落戶限制，讓長期居住在本地的農民工就可以辦理落戶，成為真正意義的城市居民。

一、暫住證制度

在改革開放之前，受到計劃經濟的影響，人口的社會流動是有限制的，因為當時各種生活必需品都有嚴格供給指標，民眾無法輕易流動，因此流動人口的總體規模並不大。1958年頒佈的《戶籍登記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居民在常住地之外的市、縣居住超過三日的，必須進行暫住登記，未經登記不得隨意在鄉村或者城市暫住，尤其不得在城市隨意暫住，更不得超期居住。」這僅是全國性的關於流動人口的抽象化管理規定，但如何落實來執行，則沒有相關的制度規範。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流動人口湧入城市，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諸多問題。

地方政府為了管理當地農民工，自1985年起，深圳市政府公布《深圳經濟特區暫住人員戶籍管理暫行規定》，率先實行暫住證制度，讓初到深圳的外來務工者擁有暫時居住的權利和身份。同年，中央政府也頒佈《關於城鎮暫住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以暫住證制度作為標誌非本地戶籍人口管理制度終於確立。隨後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型城市也相繼設立暫住證制度，作為當地政府管理外來人口的方式，隨後，暫住證制度全中國各地施行。這些地方政府實施暫住證制度的原因：一方面，政府實行暫住證，是為了獲得發展所需的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外來務工者進入城市後，政府需要管理他們，維持城市秩序。

暫住證是讓初到本地的外來人員有了暫時居住的權利，但是「暫住」詞語本身就蘊含著不穩定性。另外，農民工在工資收入、社會保障、子女就學等方面與城市居民存在較大差異，對居住城市的管理和公共服務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治理的需要，過去管理流動人口（主要是農民工）的「暫住證」制度已經不適應當前發展的需要，逐漸喪失其存在的價值。關於暫住證時期本地

戶籍和外地戶籍所享受福利待遇的差異，詳情參見下表四。

表四、本地戶籍和外地戶籍的差異		
	本地戶籍	外地戶籍
就業	政府對於本地戶籍的失業率比較重視，並採取措施提高就業率。	對於外地戶籍就業存在歧視，無本地戶籍無法參加公務員、事業單位考試、公益性崗位應聘等。
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項目齊全，且保障額度較高。	社會保障項目覆蓋面狹窄，許多保障不及本地戶籍。
教育	本地戶籍子女優先享受當地的優質教育資源。高考存在本地保護政策，考當地的大學分數線較低。	外地戶籍的子女只能上農民工子弟學校；或者回家鄉上學，成為留守兒童。當地的大學分數線較高，大部分省市不支持異地高考。
住房保障	本地戶籍的住房保障政策健全，包括廉租房、經濟適用房、限價房等住房保障政策。	外地戶籍基本上不能享受住房保障政策。
醫療	本地戶籍可以購買兒童醫保等其他特殊保險，生育保險僅限於本市戶籍。	外地戶籍只能享受最基本的醫療保險，其他特殊項目的醫療保險如生育保險等都不能享受。

資料來源：陳國印、張文利（2014）。

二、特殊戶籍制度的安排

在改革開放前，日常生活必需品由國家壟斷並進行分配，在改革開放後，幾乎所有的日用品都有充足的市場供應，侵蝕戶籍制度賴以運行的多層控制結構，削弱了戶籍制度對人口流動的監控效能。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戶籍改革的特點是有條件地向農村開放城市戶籍，並在一定程度上放鬆對農民的遷徙控制。近年來，儘管城市福利不斷下降，但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仍然與戶籍息息相關，戶籍

制度的本質特徵基本不變（Chan and Zhang, 1999: 848-855）。

自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人口流動不斷增加，地方政府開始實施相對靈活的戶籍政策，最顯著的是「藍印戶口」和「藍卡」制度。藍印戶口是發給投資者、購房者和專業人士的，藍印戶口的持有人通常需要支付一次性的入戶費，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費，從小城鎮的幾千元到大城市幾萬元都有（博廣，2009：58-59）。藍卡的功能更像是普通戶口，它的持有者享有大部分的社區福利和權利。這些人擁有相同的當地工資、中小學的居民學費、政治權利，最重要的是，有機會在二至五年內獲得正規的城市戶籍。

三、放寬戶籍限制

自本世紀起，中共當局推動戶籍改革，逐漸放寬戶籍限制，由 2001 年的《關於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見的通知》到 2006 年的《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戶籍放寬的地區由「小城市」拓展到「中小城市」。2010 年 1 月 31 日，「中央一號」¹⁴ 文件提出，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落戶，與當地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權益。2010 年 5 月 27 日，國務院轉發國家發改委《關於 2010 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這是首次在國務院文件中提出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居住證制度，另外，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胡祖才表示，居住證制度將全面實施。隨著人地掛鉤、人錢掛鉤等關鍵性政策的制定，農民工市民化的通道已經打開。2016 年 1 月 1 日，《居住證暫行條例》在全中國實施，居住證正式成為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享受城市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制度保障。不過，從過去的實踐來看，難以達到全國一致性標準，對外來人口依舊具有身份標識意涵，尤其是「積分落戶制」將占絕大多數的外來人口排斥在外（楊菊花，2017：58）。

居住證制度實現市民化一條非常重要的途徑，對於廣大的農民工來說是一種福音，因為居住證相當於國外的「綠卡」，持有者原則上可以享受當地全部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但是，作為戶籍改革的重要舉措，由於戶籍改革茲事體大，

14 中共中央重視農村問題的專有名詞。

其背後賦予的各項社會福利與地方財政息息相關，因此，中共當局對於戶籍改革，是以「逐步、有條件地放寬」為原則。

然而，改革並不徹底，工具性目標重於價值性目標，各城市居住證的申請及其涵蓋福利有所不同，而實際作法是各城市根據實際情況，自行規劃制定農民工落戶的具體條件。由於中國大陸的城市有等級大小的現實情況，在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上，在政策上還也有不同。目前，各地方政府都在制定居住證制度實施細則或調整原有居住證管理政策規定。但各地方的居住證含金量並不一樣，在養老保險和教育等少數關鍵公共服務仍然存在著較高門檻，農民工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待遇，還是難以得到實質性解決。

四、新型戶籍制度

農民工市民化最大的困難就是戶籍制度，戶籍改革的重點就是推進城鄉統一戶籍制度¹⁵，使戶籍逐步跟各項公共服務脫鉤，戶籍僅是一個登記居住地的作用，也就是建立一個戶籍登記與實際居住地相一致的人口資訊登記制度。

自 2014 年起，國務院推出戶籍改革的頂層設計，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戶口的性質區別，戶籍二元制將逐步退出歷史舞臺。2014 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實現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 45% 左右，努力實現 1 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2014 年 7 月，國務院發佈《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首次提出「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和由此衍生的藍印戶口等戶口類型，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體現戶籍制度的人口登記管理功能。」這也就意味著不再依據戶口性質統計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改為根據戶口登記地的城鄉地域屬性劃分統計城市戶籍人口和農村戶籍人口。

2017 年 10 月 28 日，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

15 城鄉統一戶籍制度，系指在全面推行流動人口居住證制度，逐步增加居住證的福利功能，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佔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擴大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給，到 2020 年基本實現城鎮常住人口保障性住房全覆蓋。

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因此，除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其他城市不得採取要求購買房屋、投資納稅、積分制等方式設置落戶限制。同時，居住證制度覆蓋全部未落戶的常駐人口，並保障居住證持有人在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務。

2019年2月23日，公安部表示將要全面深化以戶籍制度為重點的治安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戶籍制度。除了要全面深化以戶籍制度為重點的治安管理制度改革外，更要加快建立「新型戶籍制度」，除落戶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戶籍，還實施行政審批外，其他城市落戶基本上無任何限制，換言之，全中國大多數的中小城市，任何人想落戶當地就可以落戶。由此可知，在全面實行「新型戶籍制度」後，只要直接拿著當地的房產證，就可以到戶籍管理部門去辦理落戶。

2019年4月8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佈《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提出了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等任務。除15個城區人口在5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其餘城市將全面放開放寬落戶限制。另外，將「積極推動已在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列為2019年的重點任務，具體有三項措施：第一，城區常住人口100萬至300萬的二級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第二，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一級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並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第三，人口超過500萬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專案，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

總結上述，放寬落戶限制主要是針對中小型城市量身定做的，因為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和地產價格都已經非常高，人口繼續流入這些城市會引發房價繼續攀升，不但會使得城市居民無法獲得好的居住品質，增加城市管理難度，影響社會安定。另外，由於大城市對人口的虹吸效應，大部分中小型城市的發展潛力，一直未能得到體現。

肆、中國大陸戶籍制度改革的成效評析

一、過度誇大市民化的功效

在此背景下，國家在政策層面為農民工落戶城市敞開大門，中小城市戶籍全面放開，大城市放寬落戶條件。目前中國大陸各地政府開始尊重和接納農民工，例如深圳就對無高學歷的普通農民工給予更開放的政策，引導廣大外來務工人員走藍領及高級藍領路線，以融入深圳。不過，透過比較城市原住居民與農轉非居民的貧困發生率，農轉非居民與城市原住居民相比，其貧困發生率顯著更高，且農轉非居民內部的貧困發生率存在群體差異，被動市民化者的貧困發生率顯著高於主動市民化者。學者分析原因是戶籍變更的貧困消滅作用存在制度滯後效應，且被動市民化者居住地的經濟發展水準相對更差，市民化的收益相對較小（蔣和超，2017：75）。

另外，過往的研究過度誇大農民工對市民身份的嚮往，例如有學者認為伴隨戶籍障礙的消除，農民享有平等的就業與教育機會，收入水準全面提升，達到當前城市居民的消費水準，那麼中國大陸就會湧現一個巨大的消費需求，至少要讓中國大陸 GDP 增長翻一倍以上，市民化將會成為農民工的未來（易憲容，2013：26-27）。但是在現實中，卻存在農民工落戶積極性不高，甚至出現已經成為城市戶籍居民申請恢復農村戶籍等現象，戶籍政策與農民工落戶選擇之間所存在的矛盾之處，這也是中國大陸農民工市民化必須克服的難題。農民工落戶城市不能一概而論，不同類型城市具有不同人口資源狀況。因為城市只要有吸引力，落戶門檻無論多高，都不會阻止人口源源不斷的流入，相反的，如果城市沒有吸引力，即便落戶門檻多低，也難以吸引人口流入。

二、農民工落戶的風險考量

儘管農民工已經脫離農村生產，但是他們並不在乎是農民身份還是市民身份，在現實的生活中，他們更在乎的是戶籍的經濟收益、生活利益。農民工落戶

首先必須面對「城鄉二元結構」的基礎性秩序。農民工一方面樂於接受城市生活的便捷與諸多就業機會，一方面也感受到城市生活的壓力和風險。不充分就業的風險社會體系已經出現，農民工在城市中就業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企業隨時可能破產，工作可能瞬間失去。終身全職的勞動保障社會已經逐漸逝去，換來的是一種普遍就業的不確定性，這加劇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焦慮與不安全感（馮莉，2014：22）。

由於經濟水準的差異，農村的生活成本較低、村民間的歸屬感強、宅基地無償使用性等。對農民工而言，相較於城市生活的風險與不確定性，諸如就業市場的不穩定性、社會保障的不可靠性、社會資本的脆弱性以及生存環境的風險性，農村與土地具有確定性（李飛、杜雲素，2019：40-42）。

根據《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在進城農民工中¹⁶，40%認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2018年提高2%。從進城農民工對本地生活的適應情況看，80.6%表示對本地生活非常適應和比較適應，其中，20.8%表示非常適應，比2018年提高1.2%；僅有1.1%表示不太適應和非常不適應。進城農民工在不同城市規模生活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較2018年均有提高。但城市規模越大，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越弱，對城市生活的適應難度越大，使他們意識到城鄉的差異以及城市生活的壓力，這些風險考量和歸屬訴求，越來越多的農民工不願意落戶城市。

三、土地政策成為落戶的關鍵

土地政策也是影響農民工落戶城市的關鍵要素。當前土地政策對農村相對優渥，農村戶籍的福利待遇不斷提升；相反的，城市戶籍的各項福利難以一步到位的情況下，農民工在落戶問題上更多持觀望態度。雖然到了2018年，農村土地確權工作於基本完成¹⁷，對於全家已經遷入城市且變成城市戶籍的農民，其它基

16 進城農民工系指年末居住在城鎮地域內的農民工。城鎮地域為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上劃分城鄉的規定》劃分的區域，與計算人口城鎮化率的地域範圍相一致。

17 土地確權，系指土地所有權、土地使用權和他項權利的確認、確定，簡稱確權，也是依照法律、政策的規定確定某一範圍內的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的隸屬關係和他項權利的內容。

地¹⁸和承包地以有償方式收回，減少對其落戶決策的牽絆，保障在城市落戶農民的土地權益，但這僅限於舉家遷移落戶的情況。對於大多數農民工來說，多是父母在農村，自己在外打拼，一旦轉為城市戶籍將無法繼承父母在農村的宅基地，自己也將失去村集體成員的身份而無法再申請宅基地，同時喪失土地承包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對於能力不足、對城市生活缺乏信心的農民工來說，保留農村的土地權益成為農民不願意遷入城市的最大羈絆（張紅霞、何俊芳，2019：141）。

根據《2019年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在2019年，在省內就近就業的農民工為9,917萬人，占農民工總數的56.9%，到省外就業的外出農民工7,508萬人，占農民工總數的43.1%。從資料來看，在省內就業的本地農民工占農民工總數的56.9%。近年來，由於交通建設突飛猛進，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不斷深入鄉間，無論是跨省交通或省內交通都非常方便，這就造成農民工雖然在城市就業工作，但是與家鄉的鏈結依舊非常緊密，既能兼顧在城市就業的高經濟收益，又能享受家鄉的土地收益。儘管這些農民工已經在城市買房，但是回家鄉非常方便，父母都在農村生活，已經無落戶城市的必要性，這也導致部分農民工落戶城市的意願。

四、提高居住證的實用價值

面對著城鄉一體化、物質交流的便利、往返交通的便捷、資訊網路的暢通，農民與城市居民的生活設施、福利差距等逐漸縮小，城市身份對於農民工不再具有吸引力。相反的，伴隨著「鄉村振興戰略」、「推進精準扶貧」的推進，農村身份的優勢逐漸顯現，在實踐中，農村居民落戶城市戶籍的意願逐漸降低，甚至還有已經落戶為城市居民積極申請恢復農村戶籍的特殊現象。因此，嚮在家鄉附近的城市就業而在農村生活，或者是在家鄉附近的城市就業和生活，但是在農村擁有土地、宅基地等原有資源，就成為農民工的理想選擇。

18 宅基地是家庭戶用作住宅基地而佔有的土地，由於城鎮住宅大多是房地產開發商建造的樓房故一般住戶不涉及宅基地概念，現今的宅基地主要指農村宅基地。農村宅基地的所有權屬於農村農民集體成員所有。

如果將「城鄉一體化」視為戶籍改革的目標，戶籍問題不在於戶籍政策本身，而是附加在戶籍之上的各項利益。因此，無論是城市戶籍或農村戶籍的含金量孰高，都不是戶籍改革成功的標誌。過去，農村居民以當城市居民為榮，這是因為城市居民擁有太多農民居民享受不到的權益。現在，當城市不再設置落戶門檻的同時，卻有越來越多的農民不願意將戶籍落戶到城市，尤其是在 2020 年達成「全面脫貧」政策（鄭豔平、李鈺，2020：62-65），針對農村的福利很多，例如統建房，低保，拆遷金。另外，針對農村退休教師、農村退休職工、農村退休軍人，每月可以領取 2,000 元。由此可知，與落戶制度相比，提高居住證的實用價值，使其能享有當地完全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將成為城市留住農民工的現實選擇。

五、另類的城鄉二元結構

最近幾年，農民工對落戶城市的心態從過去的「不敢想」變成現在的「不太想」，有相當一部分農民選擇在城市買房、工作、生活，但是願意把戶籍留在農村。因為農村戶籍的「含金量」不斷提高，甚至在若干福利待遇甚至比城市戶籍更有優勢。需要注意的是，這些不願放棄農村戶籍的農民，並非放棄了都市生活，他們在城市工作、生活，也能享受到城市教育、公共衛生服務和公共文化服務，儘管在戶籍意義上他們不算是「市民化」，但是他們實質上已經是「城市人」。

過去農村居民只能在城市工作，因為無法落戶城市，所以無法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待遇，因此，成為城市居民成為農民工的努力目標。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過去農村居民拼命想成為城市居民的景象，如今卻有人想盡辦法恢復農村戶籍，但是依舊住在城市。因為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水準逐年提升，農村戶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逐年提高，在遷移的高成本下，也可能促使農民工回流農村，這固然說明中國大陸在農村全面脫貧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但也形成另類的城鄉二元結構。

伍、結論

從人口紅利角度看，農民工群體蘊含著中國大陸經濟社會進步的巨大動能，改革開放 40 年的歷程，也是數以億計農民從農村遷徙到城市、從農業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的歷程。雖然農民工過去成就「中國製造」的輝煌，但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工不僅在經濟上，在政治上、社會地位和福利保障都受到壓榨和不平等對待，不但違背社會最基本的公平正義，甚至違反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更不利於社會結構轉型和經濟可持續發展。

本文認為，戶籍制度所帶來的農民工問題，追根究柢就是不平等問題，長期以來，由於農民工一直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對於所居住的城市總是持有一種疏離感，因此，當前戶籍改革的重點，就是透過市民化政策的推行，加快融入城市，提升社會地位，讓農民工受到尊重。不過，當越來越多的城市不再設置戶籍限制，卻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工不願意將戶籍遷到城市。如果將市民化視為戶籍改革的目標，那麼戶籍改革的重點就不在於戶籍政策本身，而在於附加在戶籍之上的各項利益，因此，無論城市戶籍或農村戶籍的含金量孰高，都不是戶籍改革成功的標誌。由此可見，最根本的解決方式，就是取消戶籍制度的區隔，不再有農村戶籍和城市戶籍的區別，才是戶籍制度改革的最終目標。

參考文獻

- Chan, Kam Wing and Li Zhang (1999). "The Hukou System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Processes and Chang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0: 818-855.
- Liu, Zhiqiang (2005). "Institution and Inequality: The Hukou System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No.33: 133-157.
- Solinger, D. J (1995).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Chances for Assimilation?" In D Davis., R Kraus., B Naughton, and EJ Perry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13-1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王一鳴 (2016)。〈深化改革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中國合作經濟》，第 3 期，頁 20。
- 王小蓉 (2009)。〈大陸「農民工」群體現況與存在問題〉，《展望與探索》，第 7 卷，第 5 期，頁 53-73。
- 白永秀、劉盼 (2019)。〈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歷史演進—基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動視角〉，《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 期，頁 5-14。
- 田雪原 (2013)。〈城鎮化還是城市化〉，《人口學刊》，第 6 期，頁 5-10。
- 田錫全 (2019)。〈糧食供應轉移證制度的構建和演變（1955—1993）——以河南省為個案〉，《中共黨史研究》，第 2 期，頁 71-81。
- 李飛、杜雲素 (2019)。〈不確定性與農民工非永久遷移〉，《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第 1 期，頁 35-45。
- 李娜、尚昌武、張雅丹 (2009)。〈簡析上海市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制度〉，《勞動保障世界》，第 7 期，頁 69-70。
- 李麗梅、陳映芳、李思名 (2015)。〈中國城市戶口和居住證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級分層〉，《南京社會科學》，第 2 期，頁 52-60。
- 朱廣琴 (2017)。《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吳介民 (2019)。《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 林文軒（2016）。《轉型期中國城市農民工社會保險制度之研究（上、下）》。臺北：致知學術出版社。
- 易憲容（2013）。〈“過客”定居可讓中國 GDP 再翻番——城鎮化的實質是農民的市民化〉，《人民論壇》，第 4 期，頁 26-27。
- 馬大龍（2017）。〈“農轉非”不可急於求成〉，《北京觀察》，第 3 期，頁 22-23。
- 崔怡（2015）。〈從“民工潮”到“民工荒”的原因及對策分析〉，《中國市場》，第 35 期，頁 229-230。
- 馮莉（2014）。〈當代中國社會的個體化趨勢及其政治意義〉，《社會科學》，第 12 期，頁 22。
- 喬雪峰、聶叢笑（2013）。〈部分地方現逆城市化現象：有市民要求換為農村戶籍〉，《人民網》，9 月 24 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924/c1004-23010153.html>。2020/09/24。
- 國家統計局（2020）。〈2019 年中國城鎮化率突破 60% 戶籍城鎮化率 44.38%〉，《中國經濟網》，2 月 28 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002/28/t20200228_34360903.html。2020/09/24。
- 國家統計局（2020）。〈2019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國家統計局網》，4 月 30 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30_1742724.html。2020/09/24。
-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2019）。〈關於印發《2019 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的通知〉，《中國政府網》，4 月 8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4/08/content_5380457.htm。2020/09/24。
- 國務院（2010）。〈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出戶籍改革新思路（組圖）〉，《網易新聞》，6 月 4 日。<http://news.163.com/10/0604/13/68BAM7UH00014AEE.html>。2020/09/24。
- 國務院（2014）。〈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中國政府網》，7 月 30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7/30/content_8944.htm。2020/09/24。

- 張紅霞、何俊芳（2019）。〈制度賦權與行動選擇：新生代農民工戶籍轉換的行動邏輯與情境分析〉，《理論月刊》，第 12 期，頁 136-142。
- 郭琳琳、楊茜、王海嘯（2012）。〈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法律對策設想〉，《社會與公益》，第 6 期，頁 26-27。
- 陳國印、張文利（2014）。〈淺談消除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政策中的戶籍城鄉差異〉，《就業與保障》，第 11 期，頁 12-13。
- 短評（2016）。〈新型城鎮化要有相應的公共服務〉，《中國合作經濟》，第 3 期，頁 20。
- 黃德北（2006）。〈資本原始積累與中國的農民工〉，《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1 期，頁 109-147。
- 博廣（2009）。〈藍印戶口〉，《中國社會保障》，第 5 期，頁 58-59。
- 楊菊花（2017）。〈淺議居住證暫行條例與戶籍制度改革——兼論居住證與新型城鎮化〉，《東嶽論叢》，第 3 期，頁 58。
- 萬習剛（2010）。〈農民工問題的解決對策〉，《地理教育》，21 期，頁 26。
- 蔣和超（2010）。〈城鎮化過程中農轉非居民的貧困消滅〉，《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頁 75。
- 過子庸（2019）。《中國大陸研究概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韓永濤、樂雪飛（2012）。〈試論中國大陸“以農養工”農業政策的途徑與意義〉，《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第 1 期，頁 109-112。

Research on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Chen Ming-Tsung

Abstract

China has not experienced the synchronous transformation of occupation, region and identity from farmer to citizen as in western countries, but has experienced the "China path" from farmer to migrant worker and then to citizen identity.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is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ity employment, fixed residence and equ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itizens. These problems stem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1958. All the people 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City registered residence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which belong to cities and villages, and strictly restrict the movement of people. Migrant workers' registered residence system is registered as the core obstacle of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Registered residence reform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promote th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been living and stably employed in the city,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ively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the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gradually relax the conditions for urban settlement, solve the problem of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from the system, and realize the equal treatment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settlement of migrant workers has its risk consideration, and land policy has become the key to settle down. Therefore, the

most fundamental solution is to promote a unifie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so tha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s decoupled from all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welfar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s only the role of registration residence, and no long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it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which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household system, settlement,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 會議紀實 ||

2020年9月座談會：歐中與美中關係發展*

時 間：2020年9月11日；15:00 - 17:00

地 點：東海大學社科院 SS423 會議室

主持人：沈有忠，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理事長

與談人：蔡榮祥，中正大學政治系教授

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邱師儀，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劉兆隆，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系副教授

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0.12 第五期，頁 71-89。

討論題綱

- 一、捷克參議院議長訪台，對歐中關係的影響。
- 二、美台關係在總統大選前、後的發展趨勢。
- 三、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訪問歐洲的觀察。
- 四、前述國際關係氛圍下，兩岸關係發展趨勢。

說明

近期隨著美國衛生部長艾塞、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接連訪台，台歐與台美關係出現持續升溫，甚至突破既有框架的現象。於此同時，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也出訪歐洲，拜訪義大利、荷蘭、法國、德國等國家。除了疫情、人權以外，兩岸關係也再度成為歐中、美中關係角力的議題之一。中國崛起是機會還是威脅？這個議題在歐美從未間斷。但在香港問題、疫情爆發以後，這個問題也在輿論上出現了「轉向」的趨勢。在變化快速的國際局勢下，歐中、歐美關係的發展，值得我們持續關注。基於此，協會邀請學者進行對談，探索歐中與歐美關係在下半年變化的趨勢。

沈有忠：

過去兩、三個月來，台灣與歐洲關係的突破，看到王毅在歐洲國家訪問，再加上捷克參議院議長來台灣訪問，也因此鬧得不愉快。接著，美國除了衛生部長來台外，國務次卿也在近期來台洽談美台商務的議題，大家都知道是用美豬、美牛所換來，能不能在選前簽訂雙邊貿易協定，也是我們所關注的議題。在此變化下，台灣跟歐洲關係之間，有微妙的轉變，最近媒體也不斷報導、揣測下一個來台的歐洲國家政要是誰？層級會有多高？我相信很快就會再發生，台灣跟歐洲的關係、中國與歐洲的關係，可能會在拉鋸的過程中，在下半年產生微妙的變化。那台美的貿易、美中的摩擦，有沒有再往上提升的可能？希望可以聽聽各位老師的觀察。

蔡榮祥：

捷克參議長到台灣這件事，對我們來說是外交層次上的提升，但對對岸來說，只要我們有外交作為，就都是台獨。接下來我們仔細去看參議長韋德齊在捷克的政體體系，他是處於什麼角色和地位？捷克現任總統是 Zeman，屬於公民權利黨，而總理的政黨是 Ano2011，在國會裡沒有佔多數，所以他聯合捷克社會民主黨、共產黨等，在總共 200 席的捷克國會裡佔有 108 席，這裡面就沒有韋德齊參議長所屬的政黨，因此韋德齊的政黨在下議院是反對黨，大約 25 席左右，那就可以說是反對黨領袖來到台灣，執政黨總理或總統，可能對這件事都有意見。捷克參議院有一個很重要的權力就是如果下議院通過的法案，捷克參議院可以否決，甚至加註一些修改意見再退回到眾議院，代表捷克參議院議長權力很大。

總結這些來看，可以看到他的立場跟總統總理是不一樣的，總統總理是比較親中的，接著中國就開始報復，我調查了捷克對中國的關係，其實貿易量不大，在歐盟國家中跟中國貿易最有影響的就是德國，如果中國選擇跟歐盟的關係不好，不要買德國的機械跟工具機，那中國生產的量和品質就不會提升，這就是國際外交上的爭鋒相對。歐洲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縱使說現在有貿易逆差，我覺得從捷克這件事可以看到，捷克在過去歐盟國家裡戰略地理位置是非常複雜

的，從民主自由這個角度，參議院議長就是看到這點，在捷克也有一些人對民主自由的價值是很重視的。中國如果要刻意報復捷克，也會比較困難，因為總統和總理是親中，這有些矛盾，即使會受到損害，但這些損害都是可控管的。

歐盟在未來不可能不談論民主自由和人權，但會比過去更加警覺到中國華為、一帶一路等，跟歐洲之間的關係。口罩事件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歐洲跟中國的關係，甚至包括美國跟中國的關係。回到美中關係來看，有人說如果川普沒有當選，未來民主黨對中政策會有很大的轉變，可能會把台灣犧牲。但不要忘記，不管是誰上台，總統都要遵守台灣關係法。那當美國內部有部分人民是反中的時候，我不認為美國總統會推行和民意相違背的政策。

我們都知道美國不一定會來救台灣，美國國防部在 2019 年的印太戰略報告，裡面提到美國的國家利益是什麼？包括有，第一，保護美國人民國土與生活；第二，透過公平互衛的經濟關係來改善貿易逆差，促進美國繁榮；第三，重建美國軍事力量以維持優勢地位，依賴盟國夥伴國家來承擔對抗共同威脅責任。這點表示在亞洲要承擔共同威脅責任，就是印太戰略，如果印太戰略區少臺灣，就會產生漏洞。大家會說美國利益只保護美國的核心利益，對川普來說不是這樣界定，美國在過去可以依賴的秩序他也要去維繫。當然台灣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但是台灣是美國的次核心利益。

兩岸關係最近非常緊張，中國軍機在東南沿海飛，在這次中國軍機擾台的行動裡我們也派出 F16V 伴飛，我調查過 F16V 的性能比蘇愷 30 好，至於王金平要去大陸的事，我個人覺得是好事情，不是去求饒，而是去求和平。在古巴飛彈危機裡，當時提到蘇聯只聽得懂一種語言，就是軍事實力，只有我們軍事實力夠強大，對方才會讓步。國際政治裡必然會有衝突，但是否會真的走到這一步，我們還是抱持平常心，有高度警戒。以帛琉為例，我們的邦交國都和美國有很強的軍事連結，雖然很小，但是戰略位置很重要，中國要收買也不容易，包括美國國防部長也到帛琉。所以從很多態勢來看，台灣外交空間比以前更好。

沈有忠：

我認為兩岸緊張的局勢還有美國介入的情形，我觀察到的是印太戰略有再更

近一步強化，美國、日本、印度、澳洲要成立軍事上小北約的合作情況，再加上美國現在在訓練遠程兵力的投射能力，原本是要把德國撤出的軍隊一部份放到關島，另外更多的是在做遠程投射的訓練，可以在美國本土經過八到十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就可以把兵力投射到亞太地區來，去做作戰和防禦能力。

馬英九說首戰即終戰，我們確實都滿質疑我們是否能依靠自己的能力來完全做好台灣防禦的動作。如果能防止第一擊的話，依現在美軍的作戰能力，應該在24小時內就可以馬上投入到戰場上。

剛剛有提到帛琉跟馬紹的重要性，在上半年度，AIT跟台灣外交部與美國外交部在帛琉有很密集的互動，這些太平洋島國對台灣來說戰略地位非常重要，這些國家不見得有強大軍事能力，但他們可以提供在地理位置上、或是成為美軍轉嫁到台灣來的跳板。美國在太平洋地區，軍事上的佈局也好，政治上的施壓或檯面下的動作也好，都看出在兩岸議題上，美國國會不會袖手旁觀。

現在台灣社會還是有些疑慮，包括國民黨也表示美國不會來援助台灣，但我們看到或接受到的訊息並非如此。這次王金平到海峽論壇去，能不能談出結果？我覺得有保留，第一，他並非幫蔡英文做傳話；第二，以王金平現在的身份，在國民黨已經沒有領導地位，既沒辦法代表國民黨，也沒辦法代表台灣政府，所以我認為出席海峽論壇形式上的意義會大於實質上的意義。

劉兆隆：

美中關係有沒有可能改善？以當下來看可能看不出來美中關係為何會變成今天這樣，看到1985年廣場協議的時間點，當時美國發生三件事，第一，雷根主張減稅，他聽信芝加哥學派的話，認為減稅就能促進經濟成長，用原本要繳稅的錢去促進經濟。第二，因為冷戰關係，軍事支出大量增加。第三，雷根接受新保守主義的觀點，開始做大量的福利政策，因而產生赤字預算的問題。美國發行政府公債來解決，誰的貿易逆差多，就叫誰買，當時全世界賺走美國錢最多的國家是日本。因為美日安保條約，所以美日關係非常好，但在1985年廣場協議日本成為美國公債持有最大國時，美國告訴日本從1985年8月1日起，日幣對美國貨幣升高25%，意旨獲利全部回補，日本商品對美國輸出再也沒有任何優勢。從

1985 年開始，日本對東亞各國，包含韓國、台灣、中國等地的投資成長 300%，中國也在此時開始改革開放，在台灣也因為日本的投資開始經濟轉型。

回過頭看中國的現狀，當中國經濟起飛後，他努力讓人民幣處於超美的狀態，以維持對美國貿易的優勢，所以美中之間的爭議之一就是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人民幣在美國壓力下一直往上升值，否則貿易逆差會越來越嚴重，貿易逆差嚴重到 1997 年金融風暴時，全世界美國政府公債最大持有國已經從日本變成中國。現在中國政府持有的美國公債比以前更龐大，美國一定會解決，否則在經濟財政上也會有問題。美元之所以會強大，是來自美元跟石油，2019 年時，中共嘗試將上海的石油期貨，對俄羅斯的交易用人民幣計價。上次做這件事的是海珊，想把伊拉克的石油用歐元計價，美國就用毀滅性暴徒的罪名逮捕，並推翻他的政權。從此事上可看出，中國想把人民幣國際化，想要走出美國封鎖的決心是很強大的，這也隱含美中之間很大的衝突點。

接著為什麼川普要封殺華為，扶持台積電到美國設廠，現在全世界即使在疫情這麼嚴重的情況下，科技產業鍊的核心技術跟鍊結點是什麼川普都很清楚。中國代工再厲害，只要在晶片技術著手，就可以擊垮後段全部的生產。可以看出美國用很細緻的方式在處理貿易逆差的問題，所以就算是民主黨執政，我不認為美中緊張關係會改變，因為不論總統是誰都要處理這個問題，這個結構不會改變。

台灣在美中關係內其實什麼都不能做，我們只能選邊站，美國用標示生產地的方式來對付中國，讓外商幾乎逃出中國，外商只能移到越南、東南亞、台灣，所以中國在過去低生產成本的紅利，加上美國關稅，基本上是無利可圖，用這個方式去掏空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角色。所以台灣廠商沒有選擇，只能在這樣的政治經濟架構下做最有利的決定，不是移到越南就是回台灣。移到越南只有三個理由，第一，越南是第 13 個人口會破億的國家，擁有人口紅利、有未來性的國家。第二，越南是東亞各國裡，唯一沒有發生經濟奇蹟的國家，所以有期待性。第三，中越關係並不好，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所以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只有兩個主要國家，就是新加坡跟越南。

美台關係在總統大選前我們可看到幾個優勢，第一，當美豬美牛開放後，台灣跟美國 FTA 相關的貿易談判就是台商形成的，不論川普是否繼續為總統，這件

事都要持續下去，我預測台灣在川普選舉之前，不管條件為何，會簽訂 FTA。第二，近期之內也會開放核食，完成台灣對美日的經濟安全同盟的關係，最近日本核食的新聞異常寂靜，這不是正常的。在蔡英文期中之前，完成對美國和日本的 FTA，在 2024 年的總統當選人，應該也是民進黨，因為安全的三角形已經完成。

沈有忠：

經貿作為兩個國家衝突源頭，確實是不能被忽視，所謂國家安全或看到政治角力時，經貿在背後扮演驅動的能量非常大，如果美國對在亞太地區的盟友日本都能這樣處理的話，更何況是中國。台美日三角關係的結合，也關係到藉由食品安全再到經貿，再變成是戰略上的同盟，這樣的連結很難在第一時間就做聯想。剛剛也大膽預測一旦台美或台日簽訂經貿協議，對於民進黨長期執政是非常樂觀，我覺得台灣對於食品安全或民生議題上，是民粹化的，不見得會將經濟跟開放食品安全做掛勾，更不會把經濟跟國家安全放在一起。

我認為民進黨在這個議題上是比較被動的，因為要說服百姓今天開放美豬美牛是為了換取台美的 FTA，確保台灣在戰略位置上有更多國家安全上的考量。某種程度上來說，國民黨也好，台灣民情輿論也好，對於日本核食、美豬美牛，還是用比較民粹的方式面對的話，沒有辦法看作是在國際上談判跟交易的籌碼的話，這樣開放對民眾的衝擊是很大的，換取到的國家安全對百姓是無感的，能不能轉換成民進黨日後的選票，要看後續選舉的操作。

劉兆隆：

我補充一下，最近有新聞是，教育部發文要求國中、小，比須使用國產的豬隻，不可使用美豬、美牛。第二個是餐盒公會表示，教育部這個公文會有困境，這樣公開進用美豬美牛，是違反公平貿易協定，最後美國或 AIT 反彈，倒楣的是底層的豬農。第二個是一般大眾在外吃飯也很難分辨。第三個是，民進黨拿出 100 億擺平豬農，已經生效，豬農到目前為止，也沒有跳出來講話。

譚偉恩：

首先，捷克參議院訪台的部分，就捷克和中國領導階層來說，兩者關係很好，為何中捷關係會變成現在這樣？這中間奇怪的部分來自於捷克的國內政治。因為捷克上一任總統基本上是相對強調民主價值的，在他卸任風範還在的情況下，對於捷克內年紀較輕的政黨，在民主價值、人權價值上，跟現在的總統是明顯相反的。像是布拉格市長所組的海盜黨，在國會法案的影響力在近幾年是非常大的。中捷關係可能在以國家為單位的領導層次的互動是好的，但在很多地方上來說，跟台灣或其他民主國家的關係會更好，真的單純因為民主、人權的價值而導致台捷關係越來越好？或是從過去開始到現在為止，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我認為不是，我認為還有其他原因，在 Zeman 在這麼久期間之內跟習近平互動，他並沒有幫捷克帶來實質的貿易利益，中國對捷克實質的經濟投資並不高，這也是反對黨在議會裡可以去杯葛、或去挑戰捷克總統的政策。

特別是在 2016 年，中國跟捷克簽署共同合作規劃綱要的諒解備忘錄之後，捷克在法律上正式進入中國一帶一路的計畫，可是捷克當地業者並沒有實質加入計畫，就像是形式上的合作，而沒有實質的建設或投資。

美台關係在總統大選之前與之後會不會有發生變化，我認為不管 11 月之後是哪個黨當選，基本上變動是不大的，不管結果如何，台美繼續合作深化的可能性和理由，都明顯強於台美關係合作停滯。其中很重要的關鍵點來自於，中國人民幣的國際化不可能在這半年內有政策倒退，美中貿易的赤字也不可能在未來一年至兩年內迅速平衡。所以美台關係的好，是在 10 月之後任何總統上台，都會再持續一年到兩年半。

接著關於中國外交部長訪歐的行程並沒有得到太多的回饋和待遇，關鍵原因可能在於歐洲對於中國的定位開始出現轉變，還有兩個理由，第一個是，對於歐盟國家來講，中國在過去特別是在 16+1 的戰略路線，會讓歐盟漸漸認為中國想要在歐洲進行所謂的分化。在 2019 年，歐盟官方文件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他把中國定義為經濟上的競爭者，另一個是系統性的敵對者，後者主要強調中國在民主制度上的差異性，還有在外交手段上的做法，還有很多議會政治都跟歐洲有

明顯的差距。歐盟可能不會再把跟中國的外交政策，放在過去五年到十年之內對中外交的首位。現在調整成與中國保持適度的距離，透過新平衡點的方式來重新界定與美國、亞洲國家還有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最後，從整體國際氛圍下來看兩岸關係，不管下一任總統是誰當選，對台灣的機會都是好的，考量到地緣戰略，畢竟我們離中國太近、離美國太遠，即使在24小時美國可以投射兵力，我們是第一時間承受最大風險的，以風險考量情況來說，我們可能在選邊站的技巧要更慎重。另外我比較擔心中國的回應，在過去中國跟美國的關係雖然不是實質上的友好，但相對處於滿平衡的狀態，雙邊高層互訪也很多。所以我認為中國跟美國之間的互動取決於貿易這件事如何處理，我選擇一個比較悲觀的論述就是，因為中國透過長期可以出口美國，如果現在川普政策是透過要求人民幣升值，或是拔除中國世界工廠，讓他喪失出口競爭力的情況，對中國未來貿易預期是悲觀的。如果貿易預期是悲觀的話，可能會促動一場冒險戰爭，因為對中國來說經濟持續成長，共產黨的政權才能維穩，如果預期美國衝擊太大以致於經濟不好，再加上洪水、糧荒等等，貿易越悲觀的時候，可能不惜發動一場所謂防禦性戰爭。

這個預測目前透過歐洲、台捷關係，可以做調整，原本美中台三邊關係，現在可能要平行的放在歐中美的三角關係當中，如果美中台的三角關係中讓中國損失越高，中國就會變得越謙卑，在他還沒發動貿易預期的防衛性戰爭之前，他對歐盟的關係就會改變這種比較跋扈的態度。對我們而言，相對就會比較不好，歐盟對中國的策略選擇就在平衡點上偏向友善。反之，如果中國現在慢慢累積實力出來，就不會比較謙卑，對歐盟來說在平衡點上的選擇就會更靠近台灣一點，或跟美國互動多一點。所以我們可以將這兩組的三邊關係放在一起看。

最後補充貿易方面，核食的部分我有點擔憂，日本跟南韓的核食案最後在上訴的意見是反轉，也就是說日本核食在經過這麼多年後，風險評估是可以的，第一次起訴韓國時，韓國是敗訴的，韓國後來使用適當保護水準的概念，或許對其他國家來說，日本核食可能隨著時間替代，核輻射的殘留量越來越低。但是韓國因為離日本很近，海域的魚群也是交錯的，所以基本上這理由是不成立的，但在上訴機構是被同意的，整個打翻日本的理由。在這情況之下，我們剛好又是

WTO 的會員國，就比較沒有辦法讓日本核食這麼輕易進來，不像台美之間的 FTA 那麼快的簽訂，可能會再拖延一段時間。

最後一點是關於各縣市豬肉的規定，我同意劉老師的看法，我們之前去臺中市政府開會的時候，主婦聯盟認為要保護學校營養午餐的安全，不可以讓台中市進口美牛，消息一出，貿易談判代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施壓台中市政府，事情就不了了之。所以美國貿易談判是非常強勢的，完全不會留任何空間，要由各縣市禁止美豬或美牛，我認為可能性很低。第一個是貿易談判代表署的關切程度非常高，而且施壓能力非常好。第二個是每個縣市午餐的預算落差非常大，所以客觀來說，是不太可行的。

沈有忠：

像捷克這種結構的國家，立場上親中，事實上親中的立場並沒有換到經濟上的好處，如果用這樣的指標去觀察，在輿論上大家都放出一個訊號，就是捷克是第一個但不會是最後一個，我們就好奇下一個來台灣的會是哪一個國家，那下一個來台灣的國家我們也用同樣的標準去評估的話，歐洲還有沒有這樣的國家，他可以在政治立場上去強調一中政策、維持親中的色彩，但是實質上他這樣的色彩並沒有帶來太多中國在經濟上的利益，這樣子的國家就可能就會變成下一個捷克。

我們也注意到，德國這陣子對亞洲的政策，也慢慢地做了一些調整，一方面考量美國不再作為全球的霸主，德國需要有自己的立場；第二個，他們過去長時間在亞洲都是佈局在中國，現在需要有所調整，這是梅克爾所發表出來的談話。如果德國作為歐盟領頭的角色，剛剛也提到說法國也有一些風向，連德國和法國都在亞洲政策上做出微調的話，那捷克這樣的小國家，作出實質的動作，會不會產生骨牌效應？

邱師儀：

捷克議長參訪台灣，從我的觀點來看，我是單邊主義者，我認為美中的鬥爭，跟台美的選邊站，跟整個世界局勢的反中，注定其他國家會陸續訪台。我常跟外

交部官員說，其實不用爭取那麼多小國家建交，只要想办法跟大國家建交起來，小國家就會過來，這樣說雖然很驕傲，但是我認為以我觀察美國政治這麼多年，美國現在的強盛，目前還沒有其他國家可以達到 50%，連中國也差很遠。討不討厭美國是一回事，我認為他還是定義世界秩序的中心，這是我比較大膽的假定。川普在 2016-2018 年之間，他所謂擺盪式的外交手段，有時候川普跟中國關係看似不好，可是一段時間又變得很好，就像川普一開始和蔡英文通電話，後來又去訪中，沒辦法捉摸川普對台灣和中國是好還是壞。那都是大家對川普還有新鮮期的不可預測性的表現，但時間久了還是會有慣性。在擺盪到台灣時會有好處隨之而來，我們可以得到多少好處就算多少，最大的好處是法制，美國總統只能當八年，但是法制可以延續幾十年，甚至百年都有可能。

但是到了 2018 年到 2020 年的 9 月，因為疫情而讓川普有很大的危機。我認為現在川普對中國的手段已經從擺盪式變成恫嚇完軟著陸，通常川普外交的手段，他會用很大的壓力讓中國發現他不只要有貿易上的利益。這種擺盪式的外交在兩國國力相當的狀況下很容易發生擦槍走火的情況，但如果兩國實力差太多的狀況下就沒辦法打，習近平最擔心的是中國的未來，還是自己的未來？如果因為做了錯誤的決定而導致自己下台的話，我相信他都會死守在那，所以現在看起來美國出手，中國都是買單的情況。

台灣是不是川普的優先？台灣在看美國政治會有盲點，我們必須了解美國人在想什麼，Pew Research 最近做了一個非常有名的民調是「在大選當中美國人在乎的是什麼？」在台灣的話，第一名一定是新冠肺炎，而在美國的第一名是經濟。這個資本主義國家不論如何都要賺錢，在結果裡看不到台灣，頂多看到外交關係。外交關係也不是講台灣，是告訴你川普在整個外交過程中重心在中國之類。所以要提醒大家，美國在乎台灣不是因為台灣很重要，是因為中國很重要，中國很重要是因為美國要把它壓下去，當這個假設成立，美國需要讓中國痛的東西，在過去可能是香港，那在現在就是台灣。

縱使如此，美國百姓並不在意台灣，這是不能被輕忽的事實，我們台灣是個小國家，也需要選邊站，但選邊站的心態並不是我很重要，而是因為剛好有一個霸凌我的國家對美國來說很重要。剛剛民調中提到最在意的經濟，經濟因素最重

要的還是中國貿易。到頭來，美台關係之間的好，不是對川普選舉有直接的幫助，而是間接的幫助，川普如何去操縱中國議題，換取在鐵票州的選票。川普本身對國際關係是很無知的，他只能透過 Pompeo 來處理，要釐清川普最在意的是經濟，台灣只是其中的工具。在台灣有很多年輕人被中共恫嚇到就錯估形勢，我認為這是一個危機。

美國選舉除了總統選情之外，其實還有參議院和眾議院的選舉，最好的情況是一致性政府，現在拜登當選的機率還是很高，有沒有可能美國在 2020 年又回到建制派，也就是拜登當選。我認為拜登如果當選，台美甚至會回到原點。

最後是軍事的部署，美國天天在飛 EP-3E 偵察機，還有更厲害的是 RC-135 偵察機，甚至可以窺視解放軍的演習，美國甚至掌握雷達電子參數，中國現在就像被一把劍架在脖子上。上個月美國有三架現役戰機，同時有消息出來美國有戰略遠程加農砲（SLRC），射程達到 1,600 公里，美國的策略裡把日本、韓國、越南、菲律賓都拉進來，他要一小時就能夠打北京跟上海，美國有很多航母艦隊，所以美國要打中國也不用三天，在十幾個小時內就有機會。美國不會無緣無故幫台灣，台灣必須要天助自助。

那中國如何因應，我覺得杭廷頓文化的隔閡和競爭，已經驗證在美中之間，台灣人一定有感覺跟中國人越來越難溝通，在沒辦法溝通下就有可能錯估。最後講到台灣，我覺得要恢復徵兵制度，不恢復徵兵制度就沒辦法讓台灣再強盛起來，我們有愛國者飛彈、F16v、國艦國造等，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跟中國打起來不會是大規模，頂多是移動式點對點。依美國現在的戰力，如果台灣可以配合整合在一起，中共幾乎是很難渡過台海。台灣要以色列化、徵兵化，將戰鬥力上升到一定的品質。至少要把我們的心理素質武裝起來。

沈有忠：

如果川普作為一個擺盪者的話，如果 11 月會敗選，那他的任期只剩下幾個月，在這些剩下時間裡，台灣還可以在川普身上要到什麼東西？某種程度來說，我認為 11 月以前在美中競爭的格局底下，用現實主義來說，台灣確實還有好處可以得到，那現階段來說，國民黨去反美豬美牛，不就阻礙我們去獲得好處？從

國家利益或美中台關係來看，一方面我們要提醒台灣民眾不要過於民粹，二方面是不是也要提醒國民黨會成為妨礙川普給台灣更多好處的原因。

邱師儀：

川普說了，他如果選輸，就不承認這場選舉。所以美國會陷入無止境的內亂一直到1月20號。我是自由貿易的信奉者，市場上東西吃或不吃大家可以自己選擇，但是要以標示清楚為前提。那為什麼國民黨會這樣，因為過去民進黨也很反對。國民黨現在很大的問題是江啟臣被蘇起、馬英九、吳敦義等人綁架。我認為美豬美牛這些事情，蔡英文要釋出善意，現在台灣民調大部分都反美豬美牛，而且比例很高。民進黨在政策上是有問題的，但是依國民黨在選戰上的拙劣程度，還是會輸。

沈有忠：

所以政黨利益、國家利益、短期和長期的利益，在美豬美牛的議題上，確實看到很嚴重的分裂情況，對於在野政黨來講，他們會認為這是可以操作選票的議題，但是事實上在操作選票的過程中，可能會忽略整個國家整體的利益，或是長期來講，國民黨有一天還是有執政的可能性，如果現在用公投來反對這些議題，使得台美經貿議題的合作或是戰略議題上的合作層次也因此停滯，這結果是要全台灣共同承擔。將來國民黨重返執政時，也要回過頭來解決這些問題，就像現在民進黨的困境一樣。不知道江啟臣在明年黨主席選舉以後會不會得到更強的正當性，我們還是去觀察國民黨在未來能不能再重新去強化領導的正當性，尤其是年輕一輩。

邱師儀：

江啟臣是個性的問題，倒不是正當性，他其實和蔡英文很像，我覺得國民黨未來是很悲觀的。

林子立：

我在 2006 年去英國唸書時，那個年代中歐關係都是美好的，雖然有一些挫折、挑戰，和一些美國因素，但基本上中歐的合作是相當密切的。沒想到中美對抗之後，歐洲自然而然就被捲進來，中國一直在調整對於歐盟的態度，因為一開始他們認為歐盟就是一個超國家組織，如果你能影響布魯塞爾，你就搞定了整個歐洲，很快地他發現，歐洲是誰都搞不定的國家，從武器經營的事件裡，中國採取分額自治的戰略，只要專注於把倫敦、巴黎、柏林三個大國的關係處理好就好。其實歐盟在經貿上非常一致之外，並不是只有中國這樣做，俄羅斯也這樣做，美國也是要搞分裂歐盟，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長期以來就有這個問題，但是這主要發展還是以經貿關係為主，對於中國還沒有發生 COVID-19 和香港事件時，中國需要歐洲最重要的是技術，因為美國對於輸出技術到中國這件事比歐洲小心很多。所以歐洲是中國主要技術來源，對於歐洲治理都是相當謹慎。

但這次捷克這件事引起了歐洲人的公憤，捷克絕對不會是第一個，下一個我覺得比較有可能的是瑞典。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2015 年有一個叫桂敏海的香港書商，歸化為瑞典籍之後，在泰國旅行被中國公安帶走，瑞典要營救他，但是都沒辦法，從此瑞典討厭中國的名次就成為歐洲第一名。所以不是捷克人最反中，整個歐洲越富裕的國家越不喜歡中國。瑞典將境內所有孔子學院都關掉，將上海市的姐妹關係也切斷。

但我們不要以為這樣就會愛台灣，瑞典是相當精熟國際法的國家，台灣在 ISO 3166 裡是中國的一省，所以通告所有關稅地方把 China Taiwan 改成 Province of China，所以，我們要謹慎處理歐洲整體的反中、親台，美中對抗跟愛台灣是兩件事。我們如何利用反中的情緒，確保強化台歐之間的可能性。當大家都討厭中國的時候，我們就是爭。再回到歐中關係，中國要從歐洲得到什麼？技術是一個，現在變成中美對抗的時候，他要避免歐美合作，一起新冷戰的形成。

那歐洲要什麼？要利用中美對抗來克服現在跟中美貿易談判得不到的東西，他們要市場進入，不要去壟斷市場，這是長期歐洲跟美中談判問題是一樣的。利用中美對抗的時候，盡可能撈取對歐洲利益的保障，從而保障歐盟在美中歐三角

關係裡，擔任平衡的角色。我們可以看到9月13、14號就是高峰會，現在主席國是德國，大家認為未來半年歐洲會相對的團結，德、法都有形成了共識，對於戰狼式外交的中國要更有警覺。

看整個歐洲對於中國的態度，和美國不同，美國已經將中國打成意識形態上的敵人，歐洲還沒有。歐洲雖然討厭中國，但是清楚知道貿易利益來源是源自於中國，既是對手也是夥伴。所以未來德法合作，我看好未來歐洲整合會更進一步。如果能夠帶來一個多邊主義的世界，我覺得歐洲的角色是很重要的，更能平衡美國和中國。

我研究歐洲經濟整合裡面，深刻學到一點，為什麼南歐國家總是輸家，因為競爭力不足，在雙邊貿易協定簽訂的時候，競爭力不足的會很劣勢。我們現在一直要跟美國簽FTA，我們是順差多，如果我們躲在多邊的貿易架構裡，美國就不能夠單邊霸凌我們，但是我們現在要利用美國來保護自己的時候，美國也會利用這一點來和我們談條件。簽完台美FTA，我們競爭力會流失多少，會有多少高科技大廠被迫去美國設廠？人才和資金也會流到美國去。這一點是國民黨要扮演的角色，也就是我們需要台美FTA，但我們需要更多監督，避免民進黨在政治上過於急切的需要，而損失更多。

再來就是核食的問題，台灣跟韓國比較接近，但是台灣需要日本勝過於韓國需要日本，如果可以做得好產地的標示，讓民眾清楚知道是否吃到核食。如果我們吃核食，我們要的不是FTA，而是CPTPP，這才是我們要的戰略目標。

剛剛提到中國的貿易，我認為中國的精英相當有自信，中國在利用2009年金融危機開始，就把自己轉型從世界工廠，成為內需經濟，他依賴出口的比重一直在下滑。我認為中美貿易戰之下，中國經濟不會再成長，也不會垮掉，會作為區域型的強權。相對地對台灣來說就是一個安全牌，我常認為台海戰爭是假議題，我無法想像中國跟美國有任何軍事衝突，所有演習都是必要的宣示動作，真正擦槍走火的軍事衝突，是不可思議的。我認為下一代年輕人對於兩岸更擔心，對於台灣更沒有信心。那我們目前要將國防預算拉到多高，才能換到安全？這也會排擠到其他預算，這是值得但也需要討論的。

沈有忠：

這同時呼應到今天的新聞，明年國防預算是 700 億，才能應付軍購後期維修的費用，未來也勢必成為選舉議題，國民黨可能操作成因為民進黨將兩岸關係惡化，所以才需要更多的武器，導致沒有更多的錢在民生上。我們還是要把該有的國防建立起來，這是防禦敵人最基本的做法。接著我們就拭目以待瑞典會不會是下一個訪台的非友邦國家。

蔡榮祥：

國際規範跟國內標準寬鬆程度不一樣的時候怎麼辦，國民黨主張要執行比中央更嚴格的法律，要零檢出，這在法律上是不合邏輯。第二個是在過去和民進黨抗議的豬農，有很多被檢查出瘦肉精，如果堅持零檢出，台灣的豬農也會很痛苦。因為美豬的議題會牽動到後續的 FTA，民進黨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要為這句話付出代價，國民黨一定對這件事做操作，只是操作好壞的差別。

再回到捷克問題，未來中國如果對捷克 SKODA 進行管制，其實 SKODA 背後是德國福斯，去打 SKODA 就是打梅克爾，所以是有難度的。這就是國際政治裡的代罪羔羊理論，國內士氣很差，就去打國外。中國共產黨最不喜歡的事情就是台灣獨立，如果打台灣會造成什麼結果？那天就會是台灣獨立。如果沒辦法在短時間內攻下台灣，內部就會混亂。我們不敢說不會有戰爭，但是如果一定要發動戰爭，現在台灣討論的是豪豬戰略，我也認為要適度的徵兵。

也許對美國來說，台灣議題不見得會浮上檯面，我問很多美國人對台灣最深的印象是什麼？不是兩岸關係或台美關係，而是民主的生活，我們現在是民主同盟，有民主這個價值在保護著。

劉兆隆：

我補充兩點，第一，我們也不用對自己的力量這麼悲觀，我有個軍官朋友說，中國有重大軍事動作的話，台灣是可以掌握的。第二點，有次和福建學者交流，他說福建是非常反彈北京要對台灣動武，不是統一與否的問題，而是台灣武器只

能攻擊到中國沿海，所以可以發現越是沿海，越在這議題上越溫和。激烈的態度往往是內陸或北京。

譚偉恩：

我認為類似捷克的國家有匈牙利、波蘭、挪威，剛剛聽到子立老師提到瑞典，讓我想另外兩個就是丹麥跟挪威，丹麥是全世界豬肉出口很厲害的國家，台灣也進口很多，所以隨著美豬議題開放，丹麥也是有機會透過經商的議題來台灣，台灣豬肉市場是國際滿覬覦的對象，美國敲開門之後，後續的聯合反應，會帶來其他類似興趣的國家可能都會來，會有骨牌效應，可能不那麼偏政治，而是在經貿議題上多一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希臘。

剛剛也有提到首次的攻擊性外交，容易在某些地方出現熱點，第一個是大家都知道的南中國海，這不是直接涉及到兩國家實質的領土，中國可能認為是自己的傳統歷史海域，他是一個適合交火的地方，對兩邊實質傷害並不大，也有象徵性意義，同時也會把像越南的國家牽扯進來。對中共來說是不錯的練兵場，所以這可能是首次發動外交首選的地點。

最後是剛剛提到有關 CPTPP 的問題，我覺得貿易是複雜的東西，我們開放美豬進來，但 FTA 如果以雙邊的角度簽訂，那相對我們其他有競爭力的產品或金融服務業，因而受到更大的市場，所以這是要整體經過計算後結果為 0 或 -1，如果最後是大於 0 的話，就值得這樣做，當然會有些反彈，那反彈特別是針對 CPTPP 的部分，跟日本在這塊不見得比較有利，台灣在競爭上是比較弱勢的，跟日本簽訂 FTA 可能會好過直接加入 CPTPP。

再來有關中國內部的問題，內循環的部分我是抱持保守的態度，不久前李克強提到中國還有六億的貧窮人口，依消費實力要馬上撐起內需市場需要時間，如果將原本出口轉為內需市場，就會變成出口商跟本地生產商的競爭，需要平衡的時間。有聽到習近平說要把內循環改為雙循環，指的是內外都要。最後我覺得美豬的議題我們都忘記一件事，我們外食人口很多，最會買美豬的可能是便當店業者，這個議題不像表面看到的這麼簡單。

邱師儀：

簡短三點，第一點就是其實我們食安問題不只美豬美牛進到台灣這樣，政黨的操作手段要一致，要有忠心的意識形態。民進黨過去和現在的說法相衝突，不要認為自己永遠站在政治正確的那一方。

第二點回應川普落選的話可以做什麼？我認為目前川普落選機會還是比較大的，大概有六成左右，我能夠預見川普如果落選，台灣在這過程當中有一點很重要，我們不要去介入美國政黨，這在美國聯邦法規是違法的，不單只是這樣，萬一你介入美國選舉，站錯邊怎麼辦。我們應該公開說我們是支持美國政府部門，並不是支持共和黨或民主黨。再來我認為可以在這時刻提出大膽的台美宣言，經貿是一個。之前陳水扁走烽火外交，小布希很不喜歡，那個烽火外交換個形態包裝，在這個時刻推出，可能會受到川普親睽。

第三個，我覺得中國實力到什麼程度可以去試一試，我們過去有很多臆測，雖然我認為他很虛，我們倒是可以做些實驗，例如他們飛機飛中線時，我們可以鎖定他，如果開個一兩槍，中國可能也不敢開戰，在被挑釁的情況下，可以開槍但不要打到就好。

林子立：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好奇，中國外交官為什麼會信奉戰狼式的外交，這是共產黨法則之下要生存，就必須把自己變成一頭狼，否則你在職場上就沒有競爭力，這種政黨只會迫使他的外交官變強硬，接著就讓大家討厭你，在過去美國還沒發難的時候，他們永遠都可以贏得戰役，可是他們輸掉戰爭，就是這個原因。現在美國開了這一槍後，擁有民主價值的國家對中國的討厭只會升高，他們的民族自尊心也會提升，這個世界就變得更對立。

再來，美國老百姓當然不在乎台灣，但美國精英將台灣視為嘴上的肉，從日本手中收回台灣的時候，AIT人就進來了，長期以來，美國將台灣視為亞太利益的延伸，今天如果台灣有什麼狀況，他如果沒有假裝聲援，要如何跟日本、南韓交代，對美國而言，我們確實有重要性，這也是符合美國利益。

沈有忠：

今天收穫非常多，用不同觀點去分析美中台，還有歐中、歐台之間的關係，我相信在未來半年，會有更超乎我們預期的情況，今天的討論對我們去想像未來和理解都會很有幫助，謝謝各位蒞臨參加，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

2020 年 11 月座談會：美國總統選後的亞太安全^{*}

時 間：2020 年 11 月 06 日；14:00 - 16:00

地 點：東海大學社科院 SS423 會議室

主持人：沈有忠，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協會理事長

與談人：蔡榮祥，中正大學政治系教授

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吳俊德，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崔進揆，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傅澤民，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0.12 第五期，頁 91-99。

討論題綱

- 一、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分析。
- 二、美國總統選後的美中關係展望。
- 三、美國總統選後的美台關係展望。
- 四、美日印澳四方會談與亞太安全。

說明

美國總統大選於十一月三日舉行。選後的美中衝突、美台關係發展都將進入新一輪的互動。就亞太地區而言，日本、澳洲如何因應美國總統選後的新局勢，也牽動整個區域安全的發展。在選前，川普總統希望在亞洲地區重新建立安全網，十月初，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前往日本，參加「美日印澳」四方對話，就地緣而言，有著對中國大陸形成包圍的安全同盟的意味。大選結束後，川普在選前的佈局是否會延續？美中關係、美台關係、以及亞太安全，是否會有變化？都是值得關切的議題。基於此，協會邀請對此議題專精的學者進行對談，探索美國總統選後的亞太地區安全發展趨勢。

沈有忠：

國際局勢變化快速，今日討論之議題隨著美國大選的發展而有所變異，台美之間在過去所談成果，是否因政黨輪替而有變化？蔡總統對外也表示當前首要之務還是政策延續，在美國新政府產生同時，也要鞏固台灣利益，除了討論台美關係，另外也關注美中關係的變化。基於此，協會邀請學者進行對談，分析此次美國大選，如果政黨輪替，對美中、美台關係會有什麼變化。

蔡榮祥：

目前選舉情勢非常接近，川普暫時落後，他試圖用法律訴訟使對手不要達到過半門檻 270。美國開票過程深深受到聯邦主義影響，各州規定不一。假定拜登當選，有一位退役將軍表示：「拜登當選，台海發生戰爭，美國不會介入」。民主黨總統長期戰略模糊，過去主要目的是擔心中國武力併吞台灣，另一方面嚇阻台灣宣布台獨。可以看出川普的對台策略上相對清晰，如果拜登上台是否改變？拜登依舊會回到模糊狀態，延續歐巴馬政策，歐巴馬任內後期，意識到亞洲情勢有變化，而提出美國再平衡政策。拜登表示雖不同意川普做法，但同意川普認為中國正對美國的經濟掠奪。民主黨已經輪替，軍售交流速度可能緩和，台灣國防預算或人力訓練都有緊縮，制度也需要時間慢慢調整和進步，我們需要自立自強。我也關注拜登上台後，中國是否會繼續武嚇台灣，如果拜登對此沒有作為，也會被人民所挑戰。

沈有忠：

關於多邊主義的部分，像是 WHO，美國會選擇在什麼情況下重新加入？對於台美或美中關係，是否會因為美國重新加入國際組織而產生實質變化？

傅澤民：

選舉結果可以發現共和黨選得不差，結構面不見得對川普不利，美政學者認為如果沒有疫情，川普會贏得選舉，疫情出現伴隨著兩種抉擇，一是不讓疫情擴

散進行大規模經濟封鎖，這也是民主黨策略，進而導致失業人口增加、經濟衰退。第二是川普染疫後快速復原使立場搖擺之人得到啟發，認為疫情並非想像嚴重，而開啟經濟大門。一般人認為穆斯林族群對川普支持率低，民調顯示卻有 33% 穆斯林支持川普，所以此次選舉讓研究者後續有很多值得觀察。

假設拜登當選，我不認為會立刻導向親中路線，拜登所面臨的國際格局完全不同，一是目前中國戰略克制的程度和過去相比是很低的，二是美國要去關注和中國之間的利益和諧程度。拜登和川普雖然同屬抗中，但做法上有很大差異。在川普任內，美國領導權受到嚴重損害，拜登會密集修補。我預測拜登確立執政團隊後，會研擬如何回到國際組織並和中國競爭領導權。屆時台灣所扮演角色會有所差異，川普任內，台灣被推至前線，在多邊主義中，美中競爭可能體現在國際組織中的領導權。台灣如何在多邊主義的規則下，呈現戰略上的重要性。

沈有忠：

對於多元族群支持川普令人好奇，一般認為民粹型政治人物排他性較強，川普也高舉保護主義和美國至上的口號，在多元族群裡仍有一定選票，且優於以往，是值得去探討的問題。

崔進揆：

川普沒有大敗，我認為美國選民相較於疫情更重視經濟問題，在疫情之前，川普的經濟政策讓人民有感，這也反映在佛羅里達的開票上；在中國議題上，也讓中國意識到美國把它視為威脅。針對族群問題，川普並沒有扮演調解的角色，反而加深族群間的對立，這也是下任總統必須要處理的問題。民調指出多數歐洲國家都不支持川普連任，拜登當選也會回到雙邊主義的外交政策路線、重回國際組織，拜登也表示，美國缺少的是領導力的問題。

關於選後美中台關係，對抗中國是不論拜登或川普都會處理的問題，川普依靠美國實力，要求盟邦配合；拜登則採取合作路線，來面對中國威脅。我認為印太戰略會繼續延續，美國提出亞洲再平衡並沒有排斥中國加入，但制定規則者必須是美國，而名稱上可能會有所改變。美台關係仍要等選舉結果確定，新政府的

外交政策走向，軍購上我認為美國不會如以往頻繁販售台灣武器，但許多合作仍會繼續執行，包括學術和經貿上的交流。

關於美日印澳四方會談與亞太安全，如上述所提，政策依舊會延續，在安全上也會選擇與美國合作，在經濟上則採取較保守做法。

沈有忠：

目前許多台美關係著重於全球架構下非官方的實質性交流，如果中國願意在拜登執政時期，在經濟上讓步，並希望台美非官方合作能降溫，拜登是否會同意或妥協？

林子立：

美國學界對川普是厭惡的，疫情之下美國死亡率是全球前三名，美國各領域都是最強大的，防疫卻如此糟糕。大選結果不論如何，目前美中關係已達到臨界點，大家都期盼選後能夠和緩，特別在經貿上。如拜登當選，如何處置華為是重要指標，這一切變化是否以台美關係為代價？目前歐洲和日韓都不信任川普，如要重拾信任，美國需要靠實力買單。如美國願意重新領導 CPTPP，在拜登領導下，從北約、歐盟等，美國民主價值同盟已經成形。目前美國內部問題相較於外部更為棘手，此次選舉結果已說明美國是民粹主義下極化的世界，這需要經濟結構的轉型以求和緩。

台美關係不會退步亦不會進步，台灣目前有些許優勢，一是國際社會已知台灣存在；在中美貿易競爭下，台灣製造業受國際肯定；三是半導體實力，這部分也能跟美國有更緊密合作。

拜登當選，對日韓和解也有進一步可能，軍事上有同盟必要性，半導體也有合作需求。不論大選結果，美國都需要台灣作為戰略盟友的基礎，期盼印太戰略越來越清晰，且以中國作為假想的對象。

沈有忠：

剛剛提及半導體和公衛，認為台灣應該在全球經濟佈局裡發揮優勢，這也呼

應蔡總統所提六大產業，這與美國未來佈局的情況能否有合作上的可能性？

吳俊德：

在德州，宗教是重要因素，因此在社會議題上立場極端保守。外來移民問題，再過 20 年情況可能有所改變，外來移民生育率高，未來少數族群可能成為多數，選情有機會翻轉。

外交政策上，美國對華政策，從拜登智囊團隊的態度可以觀察，拜登上任後外交政策會回到正常。但目前世界局勢不同以往，因此對華政策會做修正，在過往以接觸交往為主，期望改變中國，未來會轉向以競爭為主軸，作法與川普有異，與中國全面性對抗不符合美國利益，應保持競爭中可能合作關係。過去川普如孤狼外交，棄美國價值觀於一旁，只重視經濟利益。拜登政府會重新修復與盟友關係，期望在國際規則之下給予中國壓力。政策有延續性，在思維上可能重新思考，但政策不會立即轉向。

傅澤民：

目前外來移民出現極化現象，他們不歡迎有更多新移民進入，因此認為更嚴格的移民政策是有利的。移民偏好穩定，因此不希望政府有太多不確定和變動，而因此支持共和黨。

林子立：

有色人種能接受川普政府對於處理動亂的手段嗎？

傅澤民：

非裔美國人只有極少數支持川普，拉丁裔大致分成兩派，一派認為川普草菅人命，另一派認為疫情死亡率不高，失業痛苦是真實的。

蔡榮祥：

回到美中台關係，川普把美台和美中關係切割，如回到拜登政府，台灣會被

放進美中台關係一起思考，台灣可能因此被放置一旁，民主黨在過去選前選後言行不一，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崔進揆：

移民問題很重要，但依舊要考量宗教因素，這影響他們在議題上的看法，移民可能會改變結構，但宗教是價值，難以撼動。

沈有忠：

你認為美國會加入 CPTPP 嗎？

崔進揆：

如果回到多邊主義外交，可能還是會推動，畢竟一開始是由美國提倡，也會鼓勵或是要求中國參與，用國際組織的框架來約束中國。如果台灣本身要加入，還牽涉到立法問題，台灣目前還未達到可加入的標準，這也是未來需要努力的地方。

林子立：

短時間內，台灣從四小龍末端變回名列前茅，但台灣產業結構沒有改變，我質疑台灣加入經貿國際組織，是為了主權還是實質產業升級？如果台灣產業不夠尖端，加入國際組織後中小企業就會受影響。拜登執政，台美 BTA 也不會有進展，美中競爭已達臨界點，如選後要緩解，台灣就會被棄置一旁，因為台灣經濟結構影響，未必是不利，我們更應該重視的是產業競爭力。

傅澤民：

美國是正在衰退中的霸權，美中之間的差距正在縮小，這對於美中和解是一道阻礙，台灣在這當中可以發揮一些角色，也可以把拜登政府假想為歐巴馬 2.0 去做政策上的揣測。

吳俊德：

川普和拜登都認知到要讓美國重新成為領導世界強國，川普為反全球化路線，拜登強調擴大對內投資，加強自家產業競爭力，而非用貿易壁壘的方式對抗。

林子立：

我認為川普是打破既得利益架構之人，並且將製造業重新帶回美國，再搭配適當的移民人口，製造業在美國要深耕需要時間，在這思維下更需要與台灣合作。

沈有忠：

美國會加入 CPTPP 嗎？美日印澳是否會因為拜登上台產生質變？

傅澤民：

名稱上可能會有異，但內涵不會改變。美日印澳在拜登上台後，我認為實質上的合作會有所下降，前提是中國的外交政策維持現狀。

林子立：

中國在選後是否會暫緩擴張野心？

沈有忠：

短期內會有和緩，雙方都想改變目前美中關係，但誰先願意低頭是我所好奇。美中的和緩也有機會伴隨兩岸的和緩，美中雙方也有機會透過台灣來達到和解。

傅澤民：

目前是可以試著遞出橄欖枝的機會，如果是拜登政府，或許能得到預期範圍內的回覆。美中關係可以得到穩定，中國也不會再給台灣壓力。

沈有忠：

美中的和解可以透過台灣開始。很高興今天會議順利的進行，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

協會簡介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成立於 2018 年 6 月，是一個非營利、非官方、獨立於各政黨之外的民間協會。協會創立的宗旨有二：1. 建構國內、兩岸、亞太地區的產、官、學各界合作與對話平台；2. 針對亞洲區域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和平研究與區域整合的學術、調查研究以及提出具體政策建議。

基於促進兩岸與亞洲區域穩定和交流的宗旨，本協會主要的活動包括廣邀產、官、學的專家學者舉辦專題座談與演講；出版電子期刊；承攬產、官、學相關的研究計畫；出版或補助出版相關的專題書籍；邀請學者專家針對相關議題撰寫主題評析等。

協會創立之會員，主要來自學界（大學教授）、媒體朋友、各級政府文官或幕僚、基層民意代表，以及產業界的朋友。期待創造產、官、學的合作平台，以發揮分進合擊的效果。



我們相信，兩岸與區域的穩定，奠基於多元的交流與信任。而民間的交流是創造共識、建立信任的基礎。在當前國際局勢變化快速、兩岸關係始終難以突破的僵局下，本協會希望能藉由各種交流活動，激發創意和想像，共謀區域與兩岸的穩定和和平。更多關於協會的介紹、研究成果、活動等，歡迎參見協會網站。

協會網址：<https://apeptw.org>

E-mail: apeptw@gmail.com

通訊信箱：40799 台中郵局第 5-120 號信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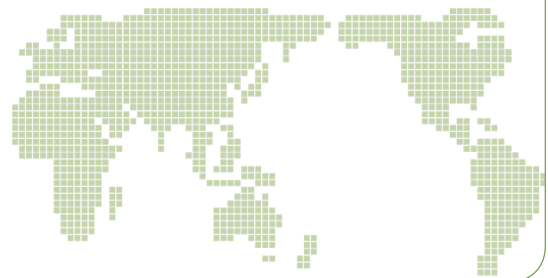
我們也歡迎各界朋友加入協會，或捐款支持協會的活動。入會辦法請參見協會網站。捐款資訊：

郵局（代號 700）帳號：0021057-0379711

戶名：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 / 沈有忠

徵稿啓事

- 一、本刊是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共同創立的刊物。本刊物旨在研討亞太區域、兩岸關係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議題。尤其歡迎針對當下的各國重要的政經議題、國際與區域的衝突和穩定，提供時事評論或研究論文。
- 二、期刊的出版分為兩個部分：1. 時事評論；2. 研究論文。時事評論配合協會舉辦的座談會，或針對當下重要的政經議題撰寫短文。研究論文則歡迎各界學者專家針對符合期刊宗旨的研究論文投稿。
- 三、期刊出版時間為每年 4、8、12 月；採紙本與電子期刊方式出版。收到稿件後，時事評論部分由編輯委員會邀稿或審查；研究論文由編輯委員會建議審查名單，送學者專家進行審查。通過審查的評論或論文，將致贈當期期刊兩冊，並酌予稿費。



四、本刊物謝絕翻譯作品、禁止一稿多投。本刊有權針對不符合格式、主題，或相關規範之稿件予以直接退稿或要求修訂，再予以審查。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請務必恪遵相關著作權法之規定。撰稿體例請至本刊網站參閱，網址：<https://apeptw.org>。

五、本刊刊登之評析與論文，版權皆歸本刊所有，未經本刊同意，禁止轉載。作者保有著作人格權，可供未來集結出版、教學與研究（非營利）使用。

六、本刊歡迎中國大陸學者專家來稿。稿件取得雙方同意之文字使用慣例，並簽妥出版同意書後予以出版。稿費依本刊規定換算人民幣後支付。

七、本刊採隨到隨審，來稿請以電子郵件寄至：apeptw@gmail.com；或將紙本以掛號寄至協會信箱：40799 台中郵局第 5-120 號信箱。本刊收到稿件後，將以電子郵件方式回覆受理狀況。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第五期】

發行人：陳文典

主編：沈有忠

副主編：張峻豪

編輯委員：廖達琪、陳佩修、蔡東杰、楊三億、蔡榮祥、陳秋政

執行編輯：林子立

出版年月：2020年12月

定價：單冊新臺幣 300 元，全年新臺幣 1000 元；

學生憑學生證訂購單冊新臺幣 250 元，全年新臺幣 800 元。

出版者：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

地址：407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電話：04-23590121

傳真：04-23590256

網址：<https://apeptw.org>

製程管理：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ISSN: 2664-3650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No.5 December 2020

| CURRENT AFFAIRS REVIEW |

Farewell to Legends and Return to Reality: Hong Kong's New Normal and the Way Forward

Derel M C Yuen

The Ruin of Legislative Politics under Post-national Security Law Hong Kong

Au Nok Hin

Changes in Hong Kong's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Outlook

Stephen Suen

| ARTICLES |

Development of US-China-India Triple Relations: View of Geopolitics

Wei-Kuang Hsu, Tung-Chieh Tsai

Research on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Chen Ming-Tsung

| FORUM MINUTES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the EU and the USA

The Asian Security after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